

文學回憶錄

譯文叢書

屠格涅夫著

蔣路譯

文學回憶錄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版初月二年九四九一
版三月十年二五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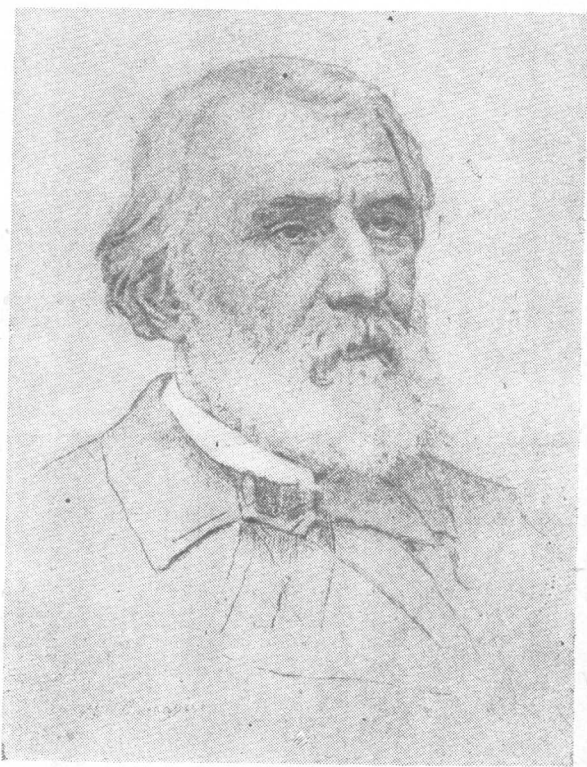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者 版 出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者 刷 印
司 公 刷 印 風 國

書 叢 文 譯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錄 憶 回 學 文
И. Тургенев
著 夫 涅 格 屠
譯 路 蔣

元 萬 一 幣 民 人 價 售



伊凡·屠格涅夫

目次

代序	一
I. P·A·普列特涅夫家的文藝晚會	九
II. 回憶柏林斯基	三一
III. 果戈理	九七
(茹科夫斯基，克雷格夫，萊蒙托夫，查果斯金)	
IV. 關於父與子	一二五

代序

一八四三年將近復活節的時候，彼得堡發生了一件事，一件本來無關緊要，而且老早被人淡忘了的事；那就是——一篇署名 T·L，題作巴拉莎的小敘事詩的出現。這 T·L 卽是我，這篇敘事詩可以看作我的文學生涯的起點。從那時算起，差不多過去二十五年了，在這兒，我想趁着我的作品發行新的版本之際，來跟讀者談談，把四分之一世紀當中積壓在我心裏的種種回憶告訴他，縱令一鱗半爪也好……Grande aevi spatium!（拉丁文：

● 巴拉莎的全稱是巴拉莎詩體小說，一八四三年春天出版，因爲那風格的新穎和情感的健
康而引起普遍的注意。——譯者。

● T·L 是屠格涅夫父母姓氏 Turgenev 與 Lutovinov 兩字的頭一字母，他的初期作品
多署此名。——譯者。

一個長的時間。——我不敢許給讀者什麼非常新奇的，「富于刺激性的」東西；我也要預先奉告他：一定有許多地方還沒有說到或者言未盡意。其所以有這類遺略，是不難解釋的。我們都知道，自從一八四三年以來，人事代謝，有的變了，有的消逝得無影無蹤了……但今天的實際與當時的史蹟之間的聯繫尚未完全斷絕；好些人都還健在——何況遺留下來的不僅是人而已。而唯獨關於那最終地退下了舞台的事物，我們纔能說出真理，說出公允的，全面的真理來。因此，我決計使我的回憶錄只限于若干斷片，若干零碎的篇章；我企望它們中間會有一種內在的統一性，至若形式上的統一和敘述的順序，我早就放棄了。不過我認爲必須預先報導一些于我直接有關的事實，因爲它們曾經決定了我的事業的出發點。

我于一八三七年唸完聖彼得堡大學文科，第二年春天便去柏林留學。我纔十九歲；但我早就夢想過這次旅行了。我確信在俄羅斯只能學到一些預備性的知識，而真正學問的源泉是在國外。其時聖彼得堡大學的教師之中沒有一個能夠動搖我這信念，況且他們自

● 這是拉丁史學家 Tacitus 的話，指人一生的時間。（按本書內關於拉丁文句子的腳註都

是由編者轉請徐家匯顧神父代爲查明補入的。）

1828
1828
25

已也都充滿了這種信念；連那以烏瓦羅夫伯爵為首的教育部也抱着同樣的見解，經常用公費派遣青年進德國各大學深造。我在柏林約莫默了兩年（前後兩次）頭一年跟我一道在大學聽課的俄羅斯人當中有N·斯坦格維奇，格拉諾夫斯基和傅羅洛夫。第二年則有日後名震遐邇的M·巴枯甯。我學的是哲學，古代語言與歷史，並在威爾德（Verder）教授指導之下特別熱情地研究黑格爾。爲了證明那時在國內大學裏所受的教育是多麼不完全，我只消引徵一件事就夠了：我在柏林聽楚姆卜特（Zumpft）講拉丁古代史，聽波克（Bok）講希臘文學史，但因為根底不好，回家之後還不得不死記拉丁文和希

② 烏瓦羅夫（S.S. Uvarov, 1786—1855）伯爵，著名的御用理論家，曾任教育部長，科學院院長等要職。——譯者。

③ 斯坦格維奇（N.V. Stankevich, 1813—1840），啓蒙運動家，三十年代莫斯科哲學文學小組的領袖。——譯者。

格拉諾夫斯基（T.N. Ghanovsky, 1813—1875）知名的黑格爾主義者及西歐派首領。——譯者。

傅羅洛夫（N.G. Frolov, 1812—1855）作家。——譯者。

「臘文法。可是我還不算一個太蹩腳的學士呢。」

青年人——我的同輩——的渴望出國，頗像斯拉夫人之向海外瓦朗格安人尋找首領。我們每個人恰好也感覺他的國土（我並非泛指祖國，而是指各人心裏所蘊藏的精神與智慧）是廣大而肥沃的，但它缺少秩序。我可以說說我自己：我個人十分清楚地知道，這樣離鄉背井，這樣勉強割斷我和我出生的生活環境之間的一切聯繫及紐帶，是有害的……然而我無可奈何。那種生活環境，那種社會，尤其是我所隸屬的那個社會圈子（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地主與農奴的圈子——全都使我無法留下來。相反地，我在自己周圍所看見的一切，幾乎都在我心頭激起不安和憤懣的感情，最後並令我發生憎恨。我不能長此動搖下去。或者屈服，溫順地循着老路子默默地走去，這是常軌；或者立刻跑開，擺脫『所有一切』，甚至拋棄我內心覺得珍貴和親切的許多物事。我就這麼做了……我縱身一跳，鑽進『德意志海』裏，讓它洗滌我，使我甦生，而臨末，當我從它的浪濤之中游出的時

○瓦朗格安人（Varangian）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居民，據說，九世紀時，斯拉夫人因為

本國秩序混亂，羣龍無首，曾派人赴斯堪的納維亞邀請挪威公爵劉里克（Rurik）兄弟

來俄羅斯爲皇。——譯者。

候，我終於變成一個「西歐主義者」並且一輩子都如此了。

我的某些同時代人走的是另一條路，是否定性較小的路，但他們也獲得了我所憧憬的自由與自覺，我連想都沒有想到要非難他們……我只願聲明一句：我沒看見自己面前有別的道路。我不能和我所憎惡的東西獸在一起，跟它呼吸同樣的空氣，這大概是由于我缺乏相當的忍耐力，性格也不夠堅強的原故罷。我必須離開我的敵人，以便從我所在的遠方更猛烈地打擊它。照我看，這個敵人有着一一定的形態和一定的名稱：這個敵人即是農奴制度。在這名義之下，我凝聚和集中了一切，決心對它作戰到底——我發誓永遠不跟它妥協……這就是我的漢尼拔誓約，●而當時向自己立下這種誓約的還不止我一個人。我到西歐去，也是爲了更好地履行它。我並不以爲我的西歐主義信仰會使我失掉對俄羅斯生活的一切同情，對它的特徵及需要的任何理解。獵人日記，這些曾經令人耳目一新，後來却被遠遠地超過了的習作，便是我在國外寫成的，其中有幾篇還是在爲「到底回國不同

● 漢尼拔 (Hannibal, 247—183, B. C.) 迦太基名將，當其九歲時，曾在祭壇前向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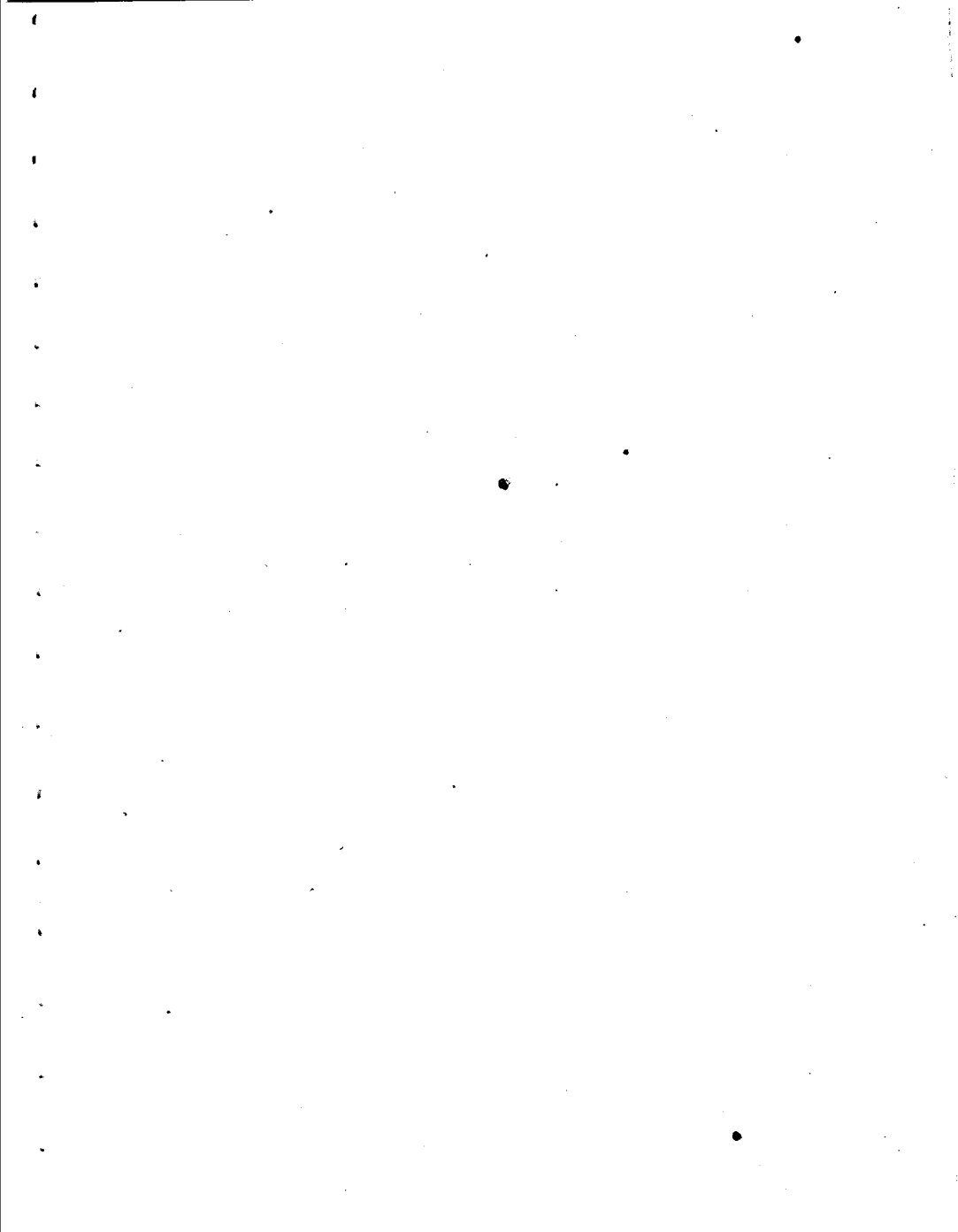
父宣誓，謂將獻身祖國，消滅羅馬；此後凡表示終生不渝之誓言皆稱爲「漢尼拔誓約」。

譯者。

呢？』的問題而躊躇不決的苦惱期間寫成的。人們也許會反駁我，說這些作品裏所保存的那一點點俄羅斯精神並非我的西歐主義信仰之賜，而是與這信仰及我的意志毫不相干的。討論諸如此類的題目殊爲困難，我只知道，假使默在俄羅斯，我準寫不出獵人日記來。同樣，我要說，某些穩健甚至熱情的，然而學識譚陋的愛國者硬要在俄羅斯與西歐之間掘下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而血統、語言和信仰却又這麼緊密地把兩者聯繫着——這鴻溝，我也是從不承認的。依照語言學者和人類學者的看法，我們斯拉夫民族不是構成印度—日耳曼人種的一個主要支脈麼？如果我們不能否認希臘對羅馬，以及這二者對日耳曼—羅馬世界的影響，那末，又有什麼理由不准這個無論怎麼說都是同族同種的世界對我們發生影響？難道我們竟是如此缺少獨立性，如此脆弱，以至應當害怕任何外來的影響，帶着小孩似的畏懼厭棄它，唯恐它會損害我們麼？我認爲不然；我認爲，恰恰相反，即使把我們推到海裏去，我們的俄羅斯本性也是洗不掉的。否則我們的民族何至于這樣不長進！我根據自己的經驗來判斷：我的皈依西歐生活原則，却並未妨礙我對於洗鍊的俄羅斯語言之敏銳的感受和熱烈的愛護。我記得，儘管祖國批評界把我攻擊得體無完膚，却從未責備我說，我的語言是不純粹，不正確的，我的文體是向外國學來的。

可是——“*bastia così*”（意大利文：夠了。）關於我個人已經講得夠多，我要說說別人了。這子讀者，于我自己都會更有趣些。讓我附註一下：我的回憶錄（我決心將它交給公眾去評判）中的一部分是照年代次序編排的，其中第一篇所記述的是一八四三年以前的事。

巴黎——巴爾——一八六八年



I P · A · 普列特涅夫家的文藝晚會

一八三七年初，我，聖彼得堡大學文科三年級生，應了俄羅斯文學教授彼得·亞力山大羅維奇·普列特涅夫^①的邀請，去參加他的文藝晚會。那以前不久，我曾經把我的繆司^②的，交給他評閱過。在後來一次演講中，彼得·亞力山大羅維奇帶着他那慣常的親切態度分析了這篇十分可笑的，用孩童的拙劣手法盲目摹擬拜倫的曼菲列特的作品，不過並沒有舉出我的名字。他走出大學，在街上碰見了我，便把我叫到身邊，父親似的斥責我，但

① 普列特涅夫 (P. A. Plemev, 1792—1865) 詩人，批評家，彼得堡大學校長兼教授。

譯者。

② 繆司 (Muse) 希臘神話中司文藝與美術之女神。

譯者。

又添上一句說我『還有點兒小才氣』這句話鼓起了我的勇氣，於是我又交了幾篇詩給他。他挑出兩篇，一年以後發表在普希金遺下的現代人上。第二篇的題目我不記得了，第一篇則是歌頌『古橡』的，開頭是：

一 一株古橡

威嚴的林中之王

把它那枝葉繽紛的腦袋

● 現代人，俄羅斯文學史及社會運動史上最重要的雜誌之一，一八三六年由普希金創刊于彼得堡，次年普氏逝世，乃歸普列特涅夫接辦，但讀者甚少。四七年起涅克拉索夫與巴納耶夫任該刊主編兼發行人（四七至四八年其批評欄編輯為柏林斯基）撰稿者盡是當時的一流天才。一八五六年後庫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相繼加入編輯部，該刊遂成為革命民主派的講壇，而與自由主義作家屠格涅夫，岡察洛夫，托爾斯泰等日益疏遠，雙方終至決裂，此後其撰稿人多係新進作者，六二年因庫爾尼雪夫斯基被捕，曾停刊半載，六六年被查封。——譯者。

這是我發表在刊物上的第一篇東西——當然是沒有署名的。

我剛踏進彼得·亞力山大羅維奇的前廳，便碰見一個中等身材的人，他已經穿好大衣，戴上帽子，正在向主人告別，用深沉的語音叫道：「對呀！對呀！我們的部長們真好！確確實實的！」——於是笑着走出去了。我只來得及注意他那白皙的牙齒和活潑的、靈敏的眼睛。

當我後來知道這人就是我迄未謀面的普希金時，我是多麼懷喪，多麼氣惱自己的遲鈍啊！在那個時候，普希金對於我，一如對於我的許多同輩，乃是半神明似的人物。我們簡直五體投地地崇拜他。大家知道，最近以來，崇拜權威是要遭人恥笑，非難乃至唾罵的。誰要承認崇拜權威，就無異在自己身上打下一記烙印，表明他是一輩子沒有出息的人。然而讓我提醒提醒我們嚴厲的青年裁判官們罷：「權威」這兩個字的涵義本來並不壞。有各種各樣的權威。以我所記得的而言，我們（我是說大學裏的同學）當中誰也不願僅僅因為一個人富裕、重要或者擁有顯貴的官爵，便在他面前低頭。這種誘惑於我們毫不相干，反之……

：甚至偉大的智者也不足以使我們動情；我們需要領袖；但在我們心目中，唯獨那有着澈底的自由信仰，幾乎是共和主義信仰的人，纔真配受到熱烈的愛戴，也唯獨在這些人身上我們纔看見了自己的導師與領袖。再說，我以為這類狂熱，甚至過份的狂熱，原是青年心靈的特色；但青年的心靈決不會因為一種抽象的理想而燃燒起來，無論這理想是多麼美麗與崇高，如果它沒有化身為一個活人——導師——的話。現在的一代跟當時的一代之間的全部差異或許就在於：我們並不以我們的偶像和我們的崇拜為恥，反而引以自豪。無可爭辯地，倘能獨樹一幟，固然是件值得尊敬的好事；誰沒有達到這地步，便不能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人」；但問題就在這兒：必須達到這地步，必須爭取這地步，如像爭取宇宙間一切美好的事物那樣；可是在一位傑出的領袖的旗幟下來開始這爭取，却是最便當的。然而也要考慮到：今天的青年人已經有了另一種觀念，另一種見解；比方說罷，在現代，假使我們集團中的誰企圖對年輕的一代要求「尊敬」，我們大概會取笑他——我們簡直會感到受了侮辱的罷；「這對於老頭子們是好的，」我們會想，「而我們所需要的只是自由，我們還是爭取它罷。」誰是誰非——從前的人呢或是現在的人——我不敢斷定；本來，青年的願望總是大公無私的，正當的；他們的目標相同，不過名義變過罷了。也許，當現代青年的一

般水準更提高，當他們的任務更艱巨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尊敬人家的罷。

我還見過普希金一次，那是他逝世前幾天，在恩格利加特大廳的音樂朝會上的事。他站在門口，靠着側柱，雙手環抱着寬闊的胸脯，帶着不滿的神情東張西望。我還記得他那褐色的，不大的臉孔；阿非利加式的嘴唇，微露的白哲的大牙齒，下垂的鬚鬚，高高的前額底下那對烏黑的，含着怒意的眼眸，幾乎看不出的眉毛以及鬆曲的頭髮……他也向我投過急速的一瞥；我傻里傻氣地死死盯住他，這大概在他心裏引起了不愉快的印象，他似乎慍怒地聳了聳肩——總之，他情緒很惡劣——便走到旁邊去了。過了幾天，我看見他躺在棺材裏，於是隨口低吟道：

「他一動不動地躺着，他那

額頭上死氣沉沉的平靜多奇怪啊……」

● 這是普希金描寫詩人達斯其跟奧涅金決鬥而死後的遺容的詩句，見歐根·奧涅金第六

章第三十二節——譯者。

可是讓我言歸正傳罷。

彼得·亞力山大羅維奇把我引進客廳，介紹給他的夫人（元配夫人）一位不算年輕，面帶病容，沉默寡言的太太。除她而外，房裏還坐着七八個人……如今他們全已故世，當時與會的一切人之中，我是僅存的一個了。真的，那已經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但來賓中間也有些青年。

這些來賓是：

第一，知名的斯科柏列夫，克萊姆涅夫的作者，日後的聖彼得堡要塞司令，其時彼得堡全體居民都記得他的儀表，剪得短短的指甲，聰穎而露倦容的，皺紋滿佈的，簡直是大兵式的臉孔，和大兵式的，不太懇摯的態度，——一言以蔽之：一位老練人物；其次，是瘋人院的作者伏耶依科夫，跛足，殘廢，毀了一半的人，風度很像古代的法院書記官，黃腫的臉，一對黑晶晶的小眼睛，迸射着惡毒的目光；再次——一個穿憲兵制服的副官，苗壯的金髮男子，

● 斯科柏列夫 (Skobalev) —— 待考 —— 譯者。

● 伏耶依科夫 (A. F. Voeikov, 1778—1839) 作家，瘋人院是他的代表作。—— 譯者。

他有着雜色的（所謂哈萊坤式的）● 瞳孔和卑屈的靈敏的表情——這是佛拉吉斯拉夫列夫，那時著名文選黎明的發行人（聽說他曾經強求人家去預約這部文選）復次：一位又高又瘦的戴眼鏡的先生，小小的腦袋，不安的動作，說話時發出歌唱似的鼻音，看樣子活像屬於德國血統的五等文官——他是翻譯家兼詩人卡爾果夫● 還有一位管交通的軍官，黝黑的臉上帶着幾分病容，兩片厚大的嘴唇露出嘲笑的神色，一部絡腮鬍子亂蓬蓬的（當時已經認為它是傾向自由主義的標誌了）——這是浮士德的譯者古柏● 那憔悴醜陋的肺病體型的人，嘴唇上，眼光中，都浮着猶豫的微笑，有着窄小但却美麗可愛的前

● 哈萊坤 (Harlequin) 是意大利民間喜劇中的丑角，常着雜色衣裳，此處爲「雜色的」或「斑色的」之意——譯者。

● 佛拉吉斯拉夫列夫 (Vladislavlev) 任職于憲兵團中的作家，一八三九至四三年間曾

選輯當時名家作品，發行一種叫黎明的年刊，頗負時譽——譯者。

● 卡爾果夫 (V. I. Karlgov, 1799—1841) 作家兼翻譯家——譯者。

● 古柏 (Guber, 1814—1847) 詩人及翻譯家——譯者。

額的，則是格萊賓卡——波列伏依的敵人（他剛剛針對波氏寫了一篇童話體的諷刺文，在那篇文章裏，一隻野蟋蟀扮演着非常討厭的角色），小俄羅斯氣派的小說與幽默故事的作者，人可以隱約地感到有一股珍奇的，溫暖的，涓涓細流貫注在他的作品裏；最後，是我們最良善的，教人不能忘懷的奧多耶夫斯基；這人無需我來描寫；任誰都記得他那漂亮的外型，神祕而柔和的眼光，孩提似的可愛的笑容，以及既溫厚又威嚴的氣概；房間裏還有一個人，他身穿長裾的，雙排鈕扣的大禮服，短短的背心上掛着一條天藍色的珍珠鑲鏈，頸巾結成蝴蝶形——他坐在角落裏，謙遜地拳着腿，偶爾咳一兩聲，咳時他急

● 格萊賓卡 (E.P. Grebenka, 1812—1848.) 烏克蘭作家。——譯者。

● 波列伏依 (N.A. Polevoy, 1796—1846.) 記者，批評家和歷史家，莫斯科電訊雜誌的編輯。——譯者。

● 原文「波列伏依」為「野生的」之意，故云。——譯者。

● 奧多耶夫斯基 (V.F. Odoevsky, 1803—1869) 公爵，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名作家，拍

林斯基對這位「理想世界的詩人」評價甚高，認為他是「最卓越的俄羅斯作家之一」。

——譯者。

忙用手去蒙住嘴巴。這人怯生生地環視四周，凝神傾聽着，他的眼睛閃耀着非凡的智慧，但他的臉孔却是最平常的俄羅斯型的——在那般由家僕和小市民出身的有教養的自學者當中，我們往往能碰到這類臉孔，它們顯然跟人家所預期的相反，都很少露出精力飽滿的神情，倒是幾乎經常帶着怯懦與憂慮的痕跡……這便是詩人科里卓夫。●

那天晚上談了些什麼，我現在業已記不清楚了；但談話既不顯得特別生動，所提出的問題也並不特別深刻和廣泛。話題時而涉及文學，時而涉及上流社會與官場新聞，——如此而已。有一兩次它帶着軍事和愛國的色彩，這大概是因為有三位軍人在座的原故。那時是一個異常沉悶的時代。政府方面掌握和鎮壓了一切，尤其在彼得堡。然而它畢竟是我們精神發展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時代……屈指一算，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但我們至今還受着發軔於當時的一切的影響與庇蔭；我們還沒有做出什麼相等的成績來；頭一年（一八三六年）春天首次公演了欽差大臣，那次晚會後幾個禮拜，即一八三七年二月或三月，

● 科里卓夫（A. V. Koljzov, 1809—1842），主要是用民歌形式描寫農民生活的

詩人，極受柏林斯基與赫爾岑推崇。——譯者。

又演出了爲皇効命。普希金還健在，並且正當精力旺盛的壯年，大家都以爲他還能工作許多歲月……有一種無稽的謠傳，說是他的皮包裏保藏着不少出色的作品，這謠言刺激着文學愛好者們去訂閱現代人——雖則訂閱的人爲數有限。但老實講，那時候公衆的注意力並未集中在普希金身上……瑪爾林斯基仍舊是最受愛戴的作家，布朗貝烏斯男

● 兩次上演我都在場——可是，我坦率地承認：我並不理解我眼前所進行的一切的意義。看

飲差大臣時，我至少常常發笑，如像全體觀衆那樣。爲皇効命却只使我感覺無聊。固然，飾

彼得羅瓦雅的伏羅貝瓦雅（Vorobyevaya）——那以前不久，當她主演謝米拉米達

時，我還譴揚過她——的嗓子已經壞了，但飾安東尼達一角的史傑潘諾娃（Stepanova）

女士的高音却是美妙絕倫的……再說，葛林卡的音樂我畢竟是應該懂得的呀。——原註。

爲皇効命原名伊凡·蘇薩雷，係偉大作曲家葛林卡（M.I. Glinka, 1804——1857）所

作愛國歌劇，上演時始改用此名。——譯者。

● 瑪爾林斯基（Martinsky）是柏斯士謝夫（A. A. Bestuzhev, 1797——1837）的

筆名，十二月黨人，浪漫主義作家，二十至三十年代時享有盛名。——譯者。

辭雄長文壇，撒旦祭典被認為登峯造極之作，幾乎是伏爾泰式的天才產品，而巡迴文庫的批評欄則是人們衡量和鑑定藝術的準繩；讀者懷着期待與尊敬的心情注視着庫科利尼克，雖然也發現神手與托克瓦托·塔索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此外，拜涅吉克托夫的詩篇亦被傳誦一時。順便提一句：在我談到的那個晚會上，格萊賓卡應主人之請，

① 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 法國作家、詩人、哲學家，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健將。
——譯者。

② 布朗貝烏斯男爵 (Baron Brambous,) 森科夫斯基 (O. I. Senkovsky, 1800—1838) 的筆名，批評家、作家，撒旦祭典是他所寫的中篇小說，他編的巡迴文庫（一八三四年創刊）為當時著名雜誌，曾暢銷十年之久。
——譯者。

③ 庫科利尼克 (N. V. Kukol'nyk, 1809—1868) 三十年代時名劇作家，喜歡寫那浮誇的、虛偽的愛國主義作品，托克瓦托·塔索是他的處女作，係五幕幻想詩劇，作于一八三〇—三一年，三三年出版，曾轟動一時，神手的全稱是神手拯救了祖國，三二年作，三四年出版，係五幕歷史詩劇。
——譯者。

④ 拜涅吉克托夫 (V. G. Benediktov, 1807—1873) 浪漫主義詩人，詳見下篇回憶柏林斯基第二節。
——譯者。

⑤ 關於公眾的這種情緒，以及這個時代的概況，我將在下一篇文章回憶柏林斯基中詳加論述。
——原註。

曾朗誦了拜涅吉克托夫的一首新作。我再重複一遍：那個時代表面上是熱鬧的，而精神上却是沉悶的；我們的談話也剛好跟這主調合拍；但真正的天才和顯赫的天才確實有過，並且留下了深刻的痕跡。如今我們眼前却在進行一件矛盾的事情：一般的水準是大大地提高了，而天才則少得多，也差得多了。

伏耶依科夫首先離開會場；他還沒有跨出房門，卡爾果夫便開始用那激動得變啞了的聲音，朗誦一首短詩來諷刺他了……這位「真正的理想主義詩人和夢想家」如像卡爾果夫所自命的，顯然沒有忘記瘋人院中題贈給他的那首無比刻薄的四行詩。斯科柏列夫說完事先準備好的幾個警句之後，也很快就告辭了。古柏埋怨起審查制度來。在當時文學界的聚會中，這個話題常常被重複……其實怎麼能教人不談呢！大家都知道關於「自由思想」和「偽預言家」之類的逸話，但文化界隨時隨地所遭受的摧殘，●現代的人大

● 審查老爺的刪改簡直近于胡鬧和開玩笑；我手頭長久保存着一份稿樣，在那上面，審查官

已替掉「這位姑娘像一朵花」一句，而代之以下句：（也是用紅墨水寫的）「這位少女

有如一朵豔麗的玫瑰。」——原註。

概是無法理解的罷。作家（無論他是誰）不能不感覺自己像個販賣違禁品的人。——談鋒又轉向旅居國外的果戈理；不過其時柏林斯基纔剛剛開始他的批評事業，還沒有人能向俄羅斯公衆說明果戈理的意義，巡迴文庫的聖哲們認為果戈理的創作只是一些粗鄙的小俄羅斯「幽默故事」。我記得佛拉吉斯拉夫列夫帶着讚賞的神情從欽差大臣中引用了一句：「照你的身份你不配撈這麼許多！」同時做了一個捉蒼蠅似的手勢，——如此而已；這隻穿着天藍色硬袖的手的揮動，以及跟大家交換眼光時意味深長的一瞥，都歷歷如在目前。屋主說了幾句有關茹科夫斯基①和他所譯的水仙②的話——這個譯本的豪華版剛剛出現不久，書中有托爾斯泰伯爵③（假若我沒有記錯的話）的插圖；他又提及另一個茹科夫斯基，一位十分拙劣的詩人，前不久用柏爾涅特（Bernet）的筆名在巡迴文庫上發表作品，曾經名噪一時的，——還講到拉絲托卜欽娜（Rastopchina）伯爵

① 欽差大臣中的市長對一名醫士說的，見第一幕第四場末尾。——譯者。

② 茹科夫斯基（V. A. Zhukovsky, 1783—1852）感傷主義詩人兼翻譯家。——譯者。

③ 水仙，或譯洞裡孩，德國詩人傅愷（Fouqué, 1777—1843）的作品。——譯者。

④ 大概是指名影刻家兼畫家F. P. 托爾斯泰（1783—1873）——譯者。

夫人，吉莫菲耶夫（Timofeev）先生，甚至關於克萊謝夫（Kreshch）先生也說了兩句，因為他們全寫過詩，而寫詩——當時是被認為很了不起的事情的。普列特涅夫開始請求科里卓夫朗誦他的新作思想（也許是世界），但科里卓夫竟異常惶恐，並且顯出手足無措的樣子，彼得·亞力山大羅維奇便只好不再堅持了。我再重複一遍：我們的談話是在已故的阿波龍·格利戈里耶夫①所謂的『太古時代』舉行的，所以它也帶着一種慎重與溫和的色彩。社會還記得，約莫十二年之前，它的最卓越的代表們遭受過怎樣的打擊；②（後來，尤其是一八五五年以後，③社會雖已覺醒，但並未向前邁進，而只是在若干青年知識份子中引起了深刻的，但也混亂的震盪。）意味着一種社會力量的生動現象，並跟其

① 格利戈里耶夫（A.A. Grigoryev, 1822—1864）批評家、詩人兼小說家。——譯者。

② 指一八五五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譯者。

③ 一八五五年尼古拉一世崩逝（其時克里米亞戰爭已近尾聲，不久俄羅斯即向土、英、法、三

國聯軍屈服），亞力山大二世即位，他鑒于這次戰爭的教訓，不得不決心改革，於是出現一個所謂『新時代』，但從一八六三年波蘭起義起，亞力山大便開始倒退，六七年卡拉科索

夫行刺案發生後，他的保守的統治已經跟尼古拉一世時代同樣黑暗了。——譯者。

他同樣乃至更重要的現象一脈相聯的文學，是沒有的，一如沒有報章雜誌，沒有公審制度，沒有人身自由；有的只是文章以及我們日後已經不可復見的文章大家。

午夜時分，幾乎等所有的人都離開了之後，我纔和科里卓夫一道走到前廳；我提議送他回家，因為我有雪橇。他同意了——一路上咳着，把身子裹在那件破舊的毛皮大衣裏。我問他爲什麼不願朗誦自己的思想……「爲什麼我要朗誦呢？」他憤憤地回答，「亞歷山大·塞爾格耶維奇。剛剛走掉就教我朗誦你真是！」——科里卓夫是很敬重普希金的。我自己也感覺我的問題提得不妥當；真的：這個態度如此謙虛的羞怯的人怎麼能從屋角裏唸出：

「宇宙之父——永恒，

永恒之子——力量，

力量的靈魂就是生命，

● 普希金的致名和父名。——譯者。

到了他所住的那條弄堂的拐角處，他從雪櫃裏走出來，匆匆地給我扣上車氈，是仍然咳嗽着和把身子裹在皮衣裏，在彼得堡正月之夜的寒霧中消失了。此後我再也沒有碰見過他。

關於彼得·亞力山大羅維奇本人，我也要說幾句。他，一位俄羅斯文學教授，並不以博學著稱，他的學識非常譴陋；可是他由衷地愛好『本行』，而且有着稍微缺乏自信的，但却正確和敏銳的鑑賞力；他說起話來簡潔，明瞭，帶熱忱。主要的是：他善于把他內心的同情傳導給自己的聽衆，善于使他們發生興味。他決不煽動學生，在他們心裏激起什麼過份的情感，如像，比方說罷，格拉諾夫斯基在他們當中所喚起的；他連那樣的動機都沒有呢——
non hic erat locus（拉丁文：『沒有地方』或『不是時候』）……他也十分謙虛，但大家全敬愛他。加之，作爲一個跟知名的文學巨匠們時相過從的人，作爲普希金，茹科夫

● 這是拉丁詩人 Horatius 的話。——譯者。

斯基、巴拉庭斯基、果戈理的朋友，作爲普希金將自己的奧涅金題獻給他的人，在我們心目中，他是很榮耀的。我們都傳誦着這首詩：『無意取悅上流社會……』
詩人給彼得·亞力山大羅維奇描繪的那幅畫像真是纖毫畢肖：這並非通常用來點綴獻詞的，俗套的溢美之言。誰要研究過普列特涅夫，就不能不承認他那——

『美廉的靈魂，

聖潔的，豐富的憧憬，

生動而清朗的詩，

● 巴拉庭斯基 (E. A. Baratinsky, 1800—1874) 名詩人，他的敘事詩對萊蒙托夫影響甚大。——譯者

● 這是普希金題獻給普列特涅夫的詩（一八二八年作）的頭一句，見歐根·奧涅金卷首。

● 這一行詩的意思很含糊，它可能是個多少帶些浪漫主義情調的插句——即法國人的所謂 *une cheville*（虛辭）；但雖則含糊，却正確地說明了一種漠然的，簡略也是美好而崇高的什麼，當時許多優秀人物的心靈中都有過這種東西的。——原註。

他也是屬於那個如今已經無可挽回地逝去了的時代的人物：這是舊時的導師，是並不博學，然而自有其聰慧之處的文人。他的待人接物，他的談吐舉止的溫文爾雅可無礙于他的靈敏乃至精明，不過這精明從未達到狡黠與詭譎的地步；而環境也使他無需狡黠：他所希冀的一切總會慢慢地，但却必然地送到他的手裏；當他要離開人世時，他可能說他是充分地享受過生活了，但充分享受倒不如適度享受的好。這種享受比任何別的享受更加穩妥；無怪古代希臘人說，上帝賜予人們的最後和最高的稟賦便是「適可而止」的感覺了。古代精神的這一面正反映在他的身上，他對它也特別同情，其他方面——他却拒不接受了。他沒有什麼所謂的「創作」才能，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這個：在他進行自我分析的時候，他的智慧的主要特徵——健全的理解力——並未辜負他。「我不會描寫」有一次他告訴我，「一切都顯得平平無奇，因此，我甚至不能正確地刻劃出我所看見的和我的生活環境。」倘要做批評家——就這個名詞的教育的、否定的意義而言——他却又缺乏

活力、感情與韌性；老實講：他缺乏勇氣。他也不是一位天生的戰士。戰場上的塵埃和烽火，一如他在戰鬪行列中可能遭遇的危險，對於他那講究細節與愛好修飾的天性是極不愉快的。況且他的社會地位，他跟宮廷的關係，也恰如他自己的天性一樣，會使他不敢接近這類角色——批評家——戰士的角色。活潑的想像，真摯的同情，深厚的友誼以及對一切富於詩意的事物的喜愛，——這就是普列特涅夫的全貌。他那為數不多的，用典範式的，雖則略嫌蒼白的語言寫成的作品，正是他的自我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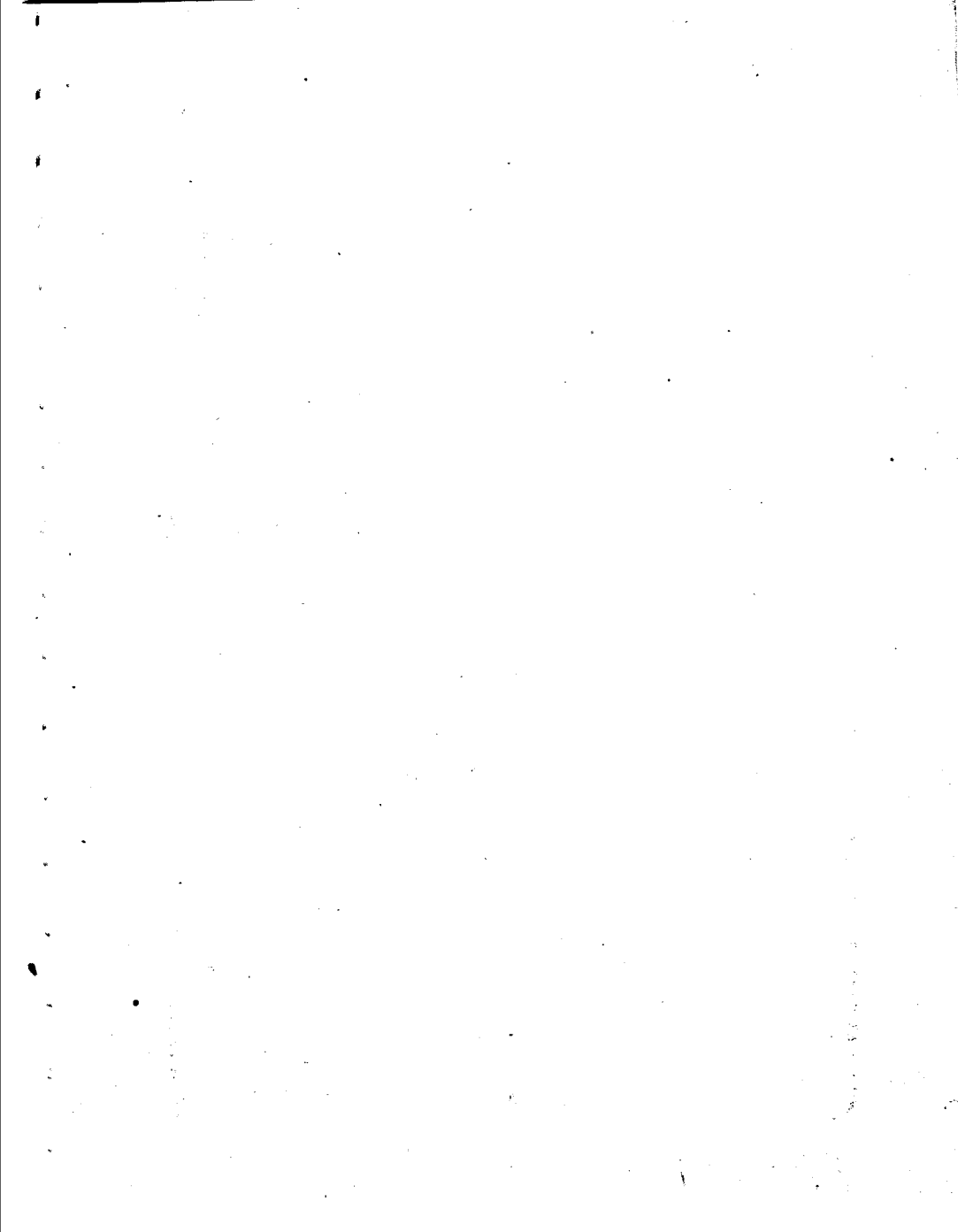
他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在自己的續絃夫人身上，在自己的子女身上，他都找得到為真正幸福所需要的一切。我旅居國外時曾經碰見過他兩次：衰弱的身體使他不能不離開彼得堡，辭去校長的職務；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是在巴黎，那是他逝世前不久的事情。他毫無怨尤地，甚至快活地忍受着異常沉重而討厭的疾病。『我知道我很快就要死了，』他對我說，『但除了感謝命運，我什麼感覺也沒有；我活夠了，我有過許多寶貴的見聞和體驗，結識過優秀的人物，還希求些什麼呢？人應該知足呀！』——後來我聽說，他臨終時，內心還是這樣泰然、柔順。

我高興跟他談天。一直到垂暮之年，他都保持着近乎孩童似的敏銳的感受力，並像青年時代一樣，一看見美的物事就大爲感動，但他決不會（縱使是在青年時代）欣賞若狂，手舞足蹈起來。他跟他一生的寶貴的回憶是不可分離的，他珍惜它們，動人地以它們爲誇耀。他覺得談普希金，談茹科夫斯基，簡直等於歡度佳節。對本國文學、本國語言，乃至這語言的音調的愛從未在他心裏冷淡下去過；他那完全的、純粹的俄羅斯血統也顯示在這件事上；盡人皆知，他是僧侶出身的。我把他的溫厚，也許還有他的處世智能，都歸功於這種血統，他又帶着早年的興致，聽人朗讀我們新進作家的作品，還發表一些不見得總是深刻，但却幾乎總是很正確的批評，而且一定要——雖則出之於一種委婉的方式——使這批評符合他在論列詩歌與藝術時所一成不變的那些原則。他離校出國期間發生的學潮令他深深地（比瞭解他的性格的我所預料的還要深）苦痛過；他爲自己的『不幸的』大學而悲傷，但他並沒有把罪過全推在青年人頭上……

像他那樣的人目前已經難得碰到了，這並不是因爲他們身上有什麼非凡的東西，而是因爲時代變了。我想，讀者該不致爲了我引他去注意這類人物之一——一位可尊敬的，

善良的舊式文人，而責備我罷。

——
一九六九年



II 回憶柏林斯基

我跟V·G·柏林斯基的結識開始於一八四三年夏天。在彼得堡，但我老早便知道他的名字了。他最初寫的一些論文由公論和望遠鏡刊出後不久（一八三六——一八三九年）彼得堡就有了關於他的傳說，說他是個非常大胆和熱情的人，無論在什麼面前也不肯讓步，而且攻擊『一切』——自然是文藝界的一切。那時候，出版物上對他是不

● 屠格涅夫跟柏林斯基結識，無論如何是二月二十三日以前的事，因為一八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柏林斯基給M·巴枯寧的信上寫着：『前不久我認識了屠格涅夫。』——譯者。

● 望遠鏡，一八三一至三六年間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種雜誌，編者為納潔日金，撰稿人有普希金，科里卓夫，K·阿克沙科夫，博果金，謝維略夫等。公論（一八三一——三五年）則是望遠鏡的副刊。柏林斯基自一八三四年在公論上發表文學的幻燈一文之後，便有系統地為這兩個刊物寫作。——譯者。

可能有什麼別的批評的。很多人，甚至青年當中的很多人，都責難他，認爲他過於狂妄，睥睨羣倫；涅瓦河●兩岸的讀者對這位莫斯科的新星本已不太信任，而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守舊反對派更趁勢火上加油。何況，他那微賤的出身（他的父親是醫生，祖父是教會執事）也破壞了我們文學中的貴族氣氛，這氣氛是從亞力山大時代，從阿查瑪斯時代●以來就造成了的。在當時那種黑暗的恐怖時期，流言在一切批判——文學批判及其他——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直到此刻爲止，流言還沒有完全失去它的意義；唯獨在民主與自由之光普照之地，它纔會消聲匿跡。關於柏林斯基的無稽之談也應時而生。據說他是個中途輟學的官費大學生，由於行爲冶蕩（柏林斯基也會行爲冶蕩！）被那時的督學戈洛赫瓦斯托夫（Golokhvastov）從大學裏趕出來了；他們斷定連他的外貌也是最可怕的；又說他是個冷評家，是納潔日金●爲了追捕自己的敵人而豢養的哈叭狗；他們硬要

●彼得堡的大河——譯者。

●亞力山大指亞力山大一世（Alexander I，1777—1825）其在位年代爲1801

至二五年。阿查瑪斯是十九世紀初葉（1815—1825年）的著名文學團體，參加者

有詩人茹科夫斯基，青年普希金等——譯者。

稱他做「柏爾倫斯基」，彷彿這樣纔能玷辱他似的。固然也可以聽到一些於他有利的意見；我記得，一家大型雜誌（幾乎是那時候唯一的大型雜誌）的發行人①曾經說他是一隻腳爪鋒利的小鳥，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青年，倘加以利用，必定不壞；——如所週知，這些話後來全實現了，那家雜誌因此大大地成功，發行人自身更獲利無算。至於我跟作家柏林斯基的結識則是這麼開始的：

一八三六年，拜涅吉克托夫的詩集（一本小冊子，裏封面上印着流行的枝葉卷鬚形的花飾——此刻我正在望着它）出版了，②它把整個社會，全體作家與批評家——所有的青年都捲入狂喜之中。我也不甘落後，爲這些詩章而着迷，我能夠背誦其中的許多篇，尤其熱愛懸崖山，乃至瑪吉莉姬裏面騎着馬駒，誇耀着「華麗而安穩的鞍子」的瑪吉莉姬。

● 納潔日金 (N. I. Nadezhdin, 1804—1856) 現實主義批評家，莫斯科大學教授，柏林斯基的老師，望遠鏡雜誌編輯。——譯者。

① 『大型雜誌』指祖國紀事，其發行人爲 A·克拉耶夫斯基。——譯者。

② 事實上拜涅吉克托夫詩集的出版和柏林斯基評論這詩集的文章的發表都在一八三五年。——譯者。

一天早晨，一位大學同學來看我，憤憤地告訴我，柏蘭舍咖啡館有一期望遠鏡，上面刊載着柏林斯基的一篇論文，在那篇論文裏，這個「小批評家」居然敢打擊我們的共同偶像，拜涅吉克托夫。我立刻跑到柏蘭舍，把整篇文章從頭至尾讀完了——不待講，也冒火了。然而——怪事！——無論是閱讀的當時或者閱讀之後，我心頭總有個什麼東西在不由自主地同意「小批評家」認為他的理由是正當的……令人不能不折服的，這使我自己驚訝，甚至惱怒。我因為這個真正出乎意外的印象而感到羞愧，於是竭力遏抑這內心的聲音；在朋友圈子中我更加猛烈地抨擊柏林斯基本人和他的論文……但是心靈深處的那個東西却悄悄地繼續對我說：他是對的……過了一些時候，我果然不再讀拜涅吉克托夫了。時至今日，誰不知道，當初柏林斯基所發表的意見，那彷彿標新立異的意見，是已經被一切人所接受，變成了公論——“a truism”（無可置疑的真理）——就像英國人所說的呢？這一道判詞，恰似同一位法官宣告的許多其他判詞一樣，是由後代簽署過了。從那時起，柏林斯基的名字便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之中了，但我們的私誼的開始還是後來的事。

我前面提起過的那篇小敘事詩巴拉莎出版以後，我就從彼得堡到鄉下去了，動身那

天，我上柏林斯基家裏去了一趟（我知道他的住址，但從沒有拜訪過他，只是在友人處見過他兩次）留下一冊給他的僕人，却並未說明我是誰。我在鄉間默了將近兩個月，忽然收到一份五月號的祖國紀事，其中有柏林斯基一篇評論我的敘事詩的洋洋大文，我把它讀了。記得他是那麼善意地批評我，那麼熱烈地讚揚我，以致我所感到的，與其說是喜悅，倒無甯說是惶恐。我『不敢相信』在莫斯科，當已故的 I·V·基萊耶夫斯基跑來慶賀我的時候，我連忙否認我那篇苦心經營的作品，一口咬定巴拉莎的作者並非我。回到彼得堡之後，我不消講，就去看了柏林斯基，我們的結交便開始了。他不久赴莫斯科完婚，回來

●祖國紀事是彼得堡出版的一種月刊，一八二〇年由史維尼美（P. P. Svinin）創刊，三

〇年因故停辦，三九年經克拉耶夫斯基（A. A. Kraevsky）復刊，克氏自任主編兼發行人，並邀柏林斯基任批評欄編輯，撰稿者多係西歐派要角如赫爾岑、格拉諾夫斯基、波特金等，後柏林斯基因與克氏不和，遂於四六年離去。六八年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和涅克拉索夫接辦該刊，使之成爲革命民主派喉舌，其影響之大，實與五十五至六十年代時的現代人無異，結果於八四年被查封。——譯者。

●柏林斯基認爲巴拉莎是『一八四三年俄羅斯詩壇上值得注意的現象』之一，說它的作者『無可爭辯地是具有獨創的才華』，而且『比一切其他的俄羅斯詩人……更接近蒙托夫所開創的那個新的詩歌流派』——譯者。

後住在森林學院的別墅裏，我也在第一帕果洛夫租下一幢別墅，幾乎每日都去拜望他，這樣一直到秋天爲止。我由衷地、深深地喜歡他，他對我也很厚愛。

我來描寫描寫他的外貌罷。

他那幅著名的石印畫像（差不多是他唯一的畫像）使人對他發生一種不正確的觀念。藝術家描繪他的相貌時，認爲自己的職責是把他畫得精神煥發，是文飾他的本色，因此便給整個頭部添上一派威嚴的，神采奕奕的表情，和軍人似的，幾乎是將軍似的雄赳赳的氣概，裝腔作勢的姿態；這些全都不切實際，跟柏林斯基的性格與習慣絲毫不符。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初初看去很不漂亮，甚至醜陋，憔悴；他的胸脯凹陷，腦袋下垂，兩隻肩胛骨顯然一高一低。任何人，即令並非醫生，看了他身上的肺結核的一切主要症狀，這可惡的病的一切所謂“habitus”（拉丁文：因素）都會立刻駭倒的。何況他差不多經常咳嗽。他有

● 基萊耶夫斯基 (I. V. Kireevsky, 1806—56) 批評家，哲學家，政論家，斯拉夫派領袖。

● 柏林斯基于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在彼得堡結婚，這一年夏天他其實是在莫斯科度過的。住

森林學院的別墅不是一八四三年夏季，而是四四年夏季的事情。——譯者。

一副不大的，蒼白而略微泛紅的臉孔，一隻不正常的塌鼻子，嘴巴有點歪，尤其是張開的時候；牙齒又細又密；一簇密茂的金髮掉在白皙漂亮的，雖然很低矮的前額上。我沒有見過誰的眼睛比柏林斯基的更美麗了。這對天藍色的，瞳孔深處閃耀着金光的眼睛平常被睫毛半掩着，激動時却睜得大大的，射出炯炯的光芒來；在他快活的當兒，他的眼神便表現着溫柔善良和無牽無掛的幸福，那確是很迷人的。柏林斯基的聲音微弱，啞澀，然而愉快；他說起話來帶着特別的重音和氣音，“*uporstvuya, volnyasy i spesha*”^①他像小孩似的從靈魂中發出笑聲。他喜歡在房間裏踱步，同時用那秀麗纖細的手指嗶嗶剝剝地敲擊着俄羅斯烟草的鼻烟壺。如果有誰在街上看見他戴一頂無邊暖帽，穿着襪襖的浣熊毛皮大衣和破爛的套鞋，用了不穩的步伐挨着牆根匆匆走過，帶着神經質的人所特有的疑懼而嚴肅的神情東張西望——如果誰僅僅看見他這光景，一定不會正確地理解他；一個外省人，當人家把柏林斯基指給他看的時候，他叫起來了：「我只在森林裏見過這樣的狼，而且是一匹中了毒的狼！」——這叫喊，我是很能領悟幾分的。在生人面前，在街上，柏林斯基很容易害羞與困惑。在家裏他通常都穿一套灰色的棉質外衣，一般地說，他極愛整潔。他的

① 涅克拉索夫的詩句。（意爲：頑強，激動而匆忙。——譯者）——原註。

聲調態度及動作教人馬上想到他的出身；他的一切習慣全是純俄羅斯的，純莫斯科的；他那血管中並沒有白白地衝流着純潔的血液——這是我們大俄羅斯僧侶階級的特色，這麼多世紀以來，他們都沒受過外國血統的影響。

柏林斯基是個——這在我們這兒是難得的——真正熱誠和真正懇摯的人，他有無限的熾情，但僅只忠於真理，容易動氣，却並不驕矜，而且善於大公無私地去愛去憎。對他亂下斷語的人們曾經因為他的「無禮」而激怒，因為他的「鹵莽」而憤慨，密告他，造他的謠——這般人大概會驚訝不置的罷，倘若他們知道這個「冷評家」的心靈竟是貞潔得近乎羞怯，平和得近乎溫柔，正直得近乎豪俠的話，他過的是近於修道士的生活，他的嘴唇沒有沾過一滴酒。就最後這一點而言，他可不像當時的莫斯科人了。柏林斯基對人對己的真誠簡直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他只是依照他所認定的真理，依照自己的原則來感覺，行動，生活。讓我舉一個例子罷。我跟他結識後不久，那些尚未得到解決或者只得到部分解決的問題又開始來煩擾他了，它們不讓人安靜，尤其不讓一個青年人安靜；這就是關於人生的意義，人們相互之間以及人們對上帝的關係，宇宙之起源，靈魂不滅等等的哲學問題。

柏林斯基既然連一門外國文也不懂（他甚至讀法文都很吃力）而在俄文書籍中又找不到能夠滿足他的切望的東西，不得已只好求助于跟朋友的談話，求助于不斷的解釋、判斷與研究了；他便懷着渴求真理的心的全部狂熱，沉醉在那裏面。正是用這種方法，還在莫斯科，他就通曉了黑格爾哲學——它在當時青年的頭腦中佔着絕對的支配地位——的主要結論乃至術語了。自然，事情進行當中並不是沒有誤解，有時甚至還有過很可笑的誤解呢；柏林斯基的友人兼老師們要把西歐科學的全部本質和精髓傳授給他，但他們自己對這些問題也往往是一知半解。●不過歌德早已說過了：

●黑格爾的名言「凡合理的都是真實的，凡真實的都是合理的」在當時的莫斯科引起過許多論爭。這話的頭半截大家全同意，但後半截該如何理解呢？難道要承認其時存在于俄羅斯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麼？人們解釋了又解釋，終於斷定：這話的後半截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那時候有誰對青年哲學家們悄悄地說一聲：黑格爾並不承認一切現存事物全是真實的，——也許可以省去好些精神勞動和煩瑣的討論罷。他們會看出這個著名的公式正像很多其他的公式一樣，不過是同一句話的單純的重複而已，其實它的意義只是如莫里哀所說的：「雅片使人睡眠，乃是因為它含有催眠的力量。」——原註。

『善良的人在自己的臟腑的憧憬裏

也常常會認出一條康莊大道來……』

而柏林斯基就正是一個『善良的人』——真誠正直的人。加之，他那天賦的非凡本能也會在這種場合救助他；但關於這，以後再說罷。——這樣，當我認識柏林斯基時，疑惑正在苦惱着他。這句話我時常聽人說起，自己也用過不止一次；但唯獨對於柏林斯基一個人，它纔能真正地、完全地適用。他的疑惑正是苦惱着他，使他廢食忘寢，執拗地折磨他，焚燒他；他不讓自己忘掉，也不知道疲勞；他不分晝夜地努力解決自己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常常，我一上他家裏去，瘦弱的，臥病（其時他正在害肺炎，差點兒送掉了性命）的他立刻就從沙發上爬起來，不斷地咳着，脈搏每分鐘達一百次，面頰上泛着濃淡不勻的紅暈，用了僅僅可以聽得見的聲音，開始那頭一天中斷了的談話。他的誠摯令我感動，他的熱情也傳染給了我，話題的重要性吸引了我；然而，談了兩三個鐘頭光景，我累了，青年時代的輕佻戰勝了我，希望休息，想到散步，吃飯，柏林斯基的妻也親自來懇求她的丈夫和我：哪怕停一會兒也好，哪怕把這討論中止片刻也好，她促他注意醫生的指示……但跟柏林斯基打商量可不容

易。「我們還沒有解決上帝的存在問題呢。」有一次，他帶着沉痛的斥責口吻對我說，「而您却想到吃啦……」我承認，寫完這一句之後，我幾乎要把它刪掉了，因為我想它很可能在我的某些讀者臉上引起一抹微笑……但親自聽見柏林斯基如何說出這句話來的人是不會想到發笑的，假如在回憶起這種可笑的爽直時微笑會浮上你的嘴唇——那除非是感動的、驚嘆的微笑……

只有得到了一個使他當時心滿意足的結果以後，柏林斯基這纔肯安靜下來，把考慮那些大問題的事攔在一邊，回復到日常的工作與事務上去。他特別喜歡跟我談天，是由于我曾經在柏林花了兩個學期工夫去研究黑格爾哲學，又剛剛回國不久，能夠把最新的結論轉告給他。那時候我們還相信哲學與形而上學的結論的現實性和重要性，雖則我們當中無論是他或我全不是什麼哲學家，並且沒有抽象地、純粹地、德國人式地思索的才能……然而，當時我們却要在哲學中探求宇宙間的一切——除了純粹的思維而外。

柏林斯基的學識並不淵博，他懂得很少，這沒有什麼稀奇。即令他的敵人也不能責備他不用功和懶惰；從幼年起便包圍着他的窮困、惡劣的教育、不幸的境遇、早年的疾病，以及後來爲了一塊麵包而不得不拚命工作——這一切加在一起，自然會妨礙柏林斯基去獲

得正確的知識，雖然，比方說罷，對於俄羅斯文學及其歷史他是研究得極透澈的。但更進一步講，在那樣的場合，這貧乏的知識正是一種特殊的標幟，差不多是一種必要。柏林斯基是一位領導人物（我讓自己這麼稱呼他）；他用自己整個的存在去貼近人民的心，從人民的好壞兩方面去全盤地表現他們。一位博學（我不說『有教養』，因為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之士，可是一位博學之士正由於自身的博學，倒也許不可能成爲四十年代的俄羅斯的這種領導人物；他也許不能完全適應他所要改造的那環境，他跟着有着不同的興趣，沒有和諧，大概也不會相互瞭解。在社會批評和美學批評的事業上，在喚起批評界自覺精神的事業上的自己同時代人的領袖（我以為我的意見能夠普遍地適用，但這次我只限于這一方面），我說，同時代人的領袖當然應該站得比他們更高，具有更足爲人楷模的智慧和更明澈的見解和更堅強的性格；然而在領袖及其追隨者羣之間，不應橫着一道鴻溝。一言以蔽之：『追隨者』應該跟領袖緊緊地聯繫着，朝着一個方向突進。做領袖的也可能在某些人心裏引起不滿，憤慨，因爲他會打擾他們，使他們失去原來的地位，推動他們向前進；他們可能詛咒他，但他們也該經常瞭解他。是的，他應當站得比他們更高，但也應當接近他們；他應當不僅關心他們的優良的品質與特點，還要關心他們的缺陷；這樣他纔會更深刻，更

苦痛地感覺到這些缺陷。森科夫斯基之博學多才，不說柏林斯基，就是大部分同時代的俄羅斯人也難以望其項背，但他留下了什麼痕迹？人們會對我說，他的活動之所以無益而且有害，並非因為他是學者，而是因為他沒有信仰，因為他對於我們是陌生人，他不理解我們，不同情我們；關於這，我不想爭辯；可是我認為他那懷疑論，他那矯飾與可厭，他那輕蔑的嘲諷，自矜博學，冷酷無情，所有他這些特徵，部分地確是由于作為學者專家的他，其目標，其傾向，全跟社會大眾截然異趣所致。森科夫斯基不懂博學，並且絕頂聰明，極富風趣，又很顯赫；青年官吏和將校都讚賞他，尤其在外省；但讀者大眾需要的不是那些，他們需要的是批評眼光，社會眼光，鑑別力，對時代的迫切要求的理解，更主要的是熾情，是熱愛無知的老百姓；而在他身上却連這樣的影子也看不到。他戲弄自己的讀者，同時暗暗地藐視他們，有如藐視一羣村夫鄙婦；他們固然被戲弄了，但也絲毫不相信他了。我希望人家不致說我有意袒護和提倡愚昧，我只是指出我們的意識發展中一個生理現象似的事實而已。當然，萊辛

● 即布朗貝烏斯男爵——譯者。

● 萊辛（Lessing, 1729—1781）德國批評家及劇作家，一個兼有古代文化的豐富知識。

養與近代精神的大學者。譯者。

●爲了要做自己一代的領袖和自己民族的完美代表，曾經把本身造成功一個幾乎無所不知的飽學通人，德意志在他身上得到反映，在他身上發現了自己的呼聲與思想，他是德意志的領導人物。在某種程度上，柏林斯基是配稱爲俄羅斯的萊辛的，就他的意義和影響而言，他的重要性確實跟偉大的德國批評家毫無差異；然而柏林斯基却不過爾爾，他缺乏豐富的科學知識。他會把老庇得（查坦姆的貴族）及其公子W·庇得混爲一談；但這算得了什麼！『我們全是一點一滴地學來的……』●對於那些擺在眼前的迫切問題，他可知道得很清楚。倘若他沒有親身體驗過不學無識的全部苦痛，那末，他隨時隨地爲啓蒙工作而鬪爭的那熱情，那幹勁，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德國人竭盡心力去改正本民族的缺點，深知它們的害處；俄羅斯人還會長久地爲自己的缺點受苦的罷。

無可爭辯，柏林斯基是具有一個偉大批評家的主要品質的；如果說在科學與學術間

● 查坦姆（Chatham）的伯爵庇得（Pitt，1708—1778）和他的兒子W·庇得

（1759—1806）都是英國政治家。——譯者。

● 普希金語。——譯者。

題上他需要求助于他的同志，信奉他們的意見的話，那末，在批評問題上他可無庸向任何人請教；反之，別人倒得聽從他，那主動權總是屬於他的。他的美學眼光幾乎毫無差誤，他的見解深刻入微，而且從不含糊。柏林斯基，不會被一些表面現象和裝飾品所欺瞞，也不會隨波逐流；他一下子就認出了美與醜，真與僞，還帶着無比的勇氣說出自己的判斷——全盤地，無保留地，熱情而有力地，絕對自信地說出它來。誰要親眼見過人們在批評上所常犯的錯誤（雖卓越的智者亦在所難免；只消回想一下普希金就夠了，他居然在博果金先生的市長夫人瑪爾法裏面看出了『莎士比亞之風』）●那他對柏林斯基的準確的判斷，可貴的鑑別和本能，以及『探求言外之意』的本領，就不能不感到油然而生的敬意。他那些評衡我們文學前輩的成就的論文，是不用我來多說了；在另一些論文裏，他又確定了那般還健在人間的作家的意義，給他們的事業做出結論，而這類結論，如前所述，且已為後代所接受和肯定。——這些論文，●我也不來多說了。當新的天才，新的小說與詩歌出現的時候，無

●指普希金一八三〇年所寫的關於國民制和M·P·博果金的市長夫人瑪爾法的

札記。博果金 (Pogodin, 1800—1875)——俄羅斯的歷史家，政論家，曾任莫斯科大

學教授。——譯者。

●請參閱他論述瑪爾林斯基，巴拉庭斯基，查果斯金等人的文章。——原註。

論誰也沒有比柏林斯基更早更好地發表過確切的評論，適當的、決定性的意見。萊蒙托夫，果戈理，岡察洛夫，那個首先注意到他們，說明他們的意義的，不就是他麼？此外還有多少人啊！讓我隨便舉個例罷：假如你讀過柏林斯基在他一篇例年評論當中所下的一條小小的腳註，那末你對這位批評家的『診斷』簡直非拍案叫絕不可，在那腳註裏，他單只憑着一篇商人卡拉西尼科夫之歌（登在文學報上，但未署名）便預言了作者必有偉大的前途；此類事實在柏林斯基的著作中是屢見不鮮的。我再舉一個例：二八四六年，祖國紀事上刊出了格利戈羅維奇先生的一篇題名鄉村的中篇小說，這篇東西乃是我們的文學接近人民生活的初次嘗試，是我們的第一篇『鄉村故事』——Dorfgeschichten（德文，）它的文字頗為優美，又不無感傷情調，但它含有忠實的再現農民生活的傾向，却是無可置疑的事。已故的I. I. 巴納耶夫，一個心腸很好，但極其輕佻，只能把握事物的皮相的

● 商人卡拉西尼科夫之歌的全稱是關於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維奇，青年近衛兵和勇敢的

商人卡拉西尼科夫之歌，萊蒙托夫所寫的敘事長詩，一八三七年作，次年發表於俄羅斯殘

識者的文學增刊第十八期上（並兼在文學報發表）（作者署名『V.』譯者）

● 格利戈羅維奇（D. V. Grigorovich，1822—1869）小說家，鄉村是暴露農奴制的罪

惡的作品——譯者

人他抓住鄉村中若干可笑的辭句，自慶得到了一個嘲弄的好機會，便取笑起那整篇小說來，甚至還把他認爲最有趣的幾頁拿到朋友們家裏去朗誦呢。可是，當柏林斯基讀過格利戈羅維奇先生的作品之後，不獨覺得它寫的十分出色，並且立刻確定它的意義，還預料到不久以後我們文學中所發生的那種運動和轉變；——其時巴納耶夫是多麼驚訝，那般捧腹大笑過的朋友又是多麼迷惑不解啊！他只好重讀鄉村裏的若干斷片，隨聲讚賞了。

這兒我要帶便提提當時一家大型雜誌發行人●屢次受愚弄的故事；那人很有幹才，但說到美學天稟方面，他可是不幸的。比方，柏林斯基集團中的誰給他帶來一首新詩，向他唸了，然而詩的要點何在，爲什麼值得朗誦，——關於這些，事先却一字不提。起初，那音調是譏諷的；從這音調，發行人斷定人家要給他介紹的大概是一篇最粗俗或者最荒謬的東西；因此他聳聳肩，開始發笑了；但朗誦者的譏諷的調子却慢慢地變得嚴肅，莊重，熱情起來了，發行人以爲自己弄錯了，不該那麼理解的，於是便贊同地「唔，唔」着，搖頭幌腦，甚至常常

● 巴納耶夫 (Panayev, 1812—1892) 作家兼新聞記者，三十年代末加入柏林斯基集團。

● 一八四七年起與涅克拉索夫合編現代人雜誌，但並未起領導作用。——譯者。

● 指祖國紀事的發行人A·克拉耶夫斯基。——譯者。

叫出：『要得好！』正在那時候，朗誦者又改用譏諷的聲調，之後又趁着聽者入迷的聲浪，回復到熱情的調子上來，而那人也重新表示讚賞了……倘若碰着一首長詩，這類花頭可以玩上好幾次；這教人想起一種用手指一捏一捏，那表情也隨之不斷變化的橡皮頭遊戲。臨末，可憐的發行人完全弄得沒有辦法，他那張倒也極善表情的臉上已經既不顯露由衷的稱讚，也不顯露認真的譴責了。柏林斯基雖不古板，但他自己並不喜歡諸如此類的玩意；他這人過于誠摯，甚至臨到開玩笑時也不改本性；可是當人家把這惡作劇源源本本講給他聽的時候，他連眼淚都笑出來了。

作爲批評家的柏林斯基的另一顯著特點，便是他對於那些正好被提上議事日程的，要求立刻解決的，所謂『迫切問題』的理解力。俗話說：『不速之客比韃靼人還討厭』，同樣，卽令是真理，但如果你在不該傳播的時候而去傳播它，那末，這真理比謊言更壞，因爲，一個提得不合時宜的問題只能使人迷糊，擾亂視聽。柏林斯基決不容許自己去犯天才杜勃羅留波夫^①所犯的那種錯誤；他比方講罷，決不會以深惡痛絕的態度咒罵卡富爾^②，帕麥斯吞^③。總之，他不會咒罵議會制度，說它是一種欠完善的，從而謬誤的政治形式。就假定卡

富爾該罵罷，他也會瞭解這類攻擊的不切實際（在我們俄羅斯，在一八六二年）他瞭解這些攻擊會對哪般人有好處，誰將因此而與高采烈！柏林斯基認識得很清楚：他的工作環境使他不可能超出純粹的文學批評的範圍以外。第一，在當時那種官僚政治條件、生活與審查條件之下，用另一套方式來活動是過于困難了，就是做一個文學批評家，也已經很難抗擊那威迫和告密的狂濤巨浪（由于他否定我們的偽古典派權威們而引起的）了；其

● 杜勃羅留波夫 (N. A. Dobrolybov, 1836—1861) 天才的青年批評家及政論家，六

十年代的所謂『雜色知識份子』的一個傑出代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親密戰友，曾與車氏及涅克拉索夫合編現代人，六十年代現代人分裂時，他對屠格涅夫抨擊頗多。——譯者。

● 我所以要寫上這幾句，是因為我親耳聽見過一位崇拜杜勃羅留波夫的青年如何坐在牌桌旁邊，爲要譴責他的遊伴所犯的大錯而叫道：『哪，老兄，你簡直是個卡富爾啊！』我承認我很傷心，當然不是爲了卡富爾！——原註。

● 卡富爾 (Cavour, 1810—1861) 意大利政治家。帕麥斯吞 (Palmerston, 1784—

1865) 英國政治家。按杜勃羅留波夫曾經在他的論文兩個伯爵 (一八六〇年) 和卡米洛·賓索·卡富爾伯爵的生平與逝世 (一八六一年) 裏面批評了自由主義政治家卡富爾和帕麥斯吞，而對革命家加里波的則加以讚揚。——譯者。

次，他非常清晰地看到和懂得：在每個民族的發展中，文學時代總是走在其他時代的前面，不經歷它，不爭取它，便無法前進；而批評，意味着否定一切欺詐與虛偽的批評，首先就應當分析文學現象——他本身的使命也正在于此。他的政治——社會信念極其堅定，而且確實是激烈的；但它們只停留在本能的同情和憎惡的限度之內。我再重複一遍：柏林斯基知道應用及實現這些信念是不可能的；縱然可能——他本人却既沒有充分的準備，甚至也沒有必要的資質。他也知道這一層，所以帶着他特有的，對於自己所担任的角色的實際理解，他自動地限制了本身的活動範圍，把這活動壓縮在一定的界限以內。●可是，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他却正如英國人所說的“the right man on the right place”——「人得其位，位得其人」了，關於他的繼承者們，可不能這麼說。固然他們的任務更艱巨而複雜。柏林斯基逝世前不久也開始感覺到：採取新的步驟，跨出那個狹窄的範圍的時代到來了；政治、經濟問題應該代替美學和文學問題了；但他已經把本身除外，而矚目于另一位人物，並且把那人看做自己的繼承者——那就是V·N·邁科夫，詩人的兄弟；●可惜這個才氣橫溢的青年也像不久前逝世的另一位前程無量的青年D·I·畢莎萊夫●一樣，在

自己的行程剛開始時便撒手去了。

提到畢莎萊夫的名字，我不禁想起這個故事來：一八六七年春天，當我路過彼得堡的時候，他曾經惠臨訪候過。那以前，我跟他並無一面之緣，可是讀過他寫的論文，而且很感興趣，雖然對於其中的許多觀點，總之是，對於那傾向，我不敢贊同。他那些論普希金的文章尤其激怒了我。談話之間，我向他坦率地吐露了自己的見解。初初看去，畢莎萊夫給了我這樣一個印象，使我覺得他是個正直而敏慧的人，不獨能夠，並且應當對他說真心話的。「我順便提一件事，」我開始了，「您污辱了普希金一首最動人的詩（他稱呼一位碩果僅存的高等學校的同學：『不幸的朋友』等等）啦。您斷言詩人想勸告他的朋友牽性借酒澆愁。」

● 邁科夫 (Maykov) 兄弟 A. N. 邁科夫 (1821—1887) 詩人，藝術至上主義者；V. N. 邁科夫 (1823—1847) 詩人之弟，現實主義批評家，曾代替柏林斯基担任祖國紀事批評欄編輯。——譯者。

● 畢莎萊夫 (Pisarev, 1840—1888) 啓蒙學者，批評家兼政論家，左翼急進派首領，曾主編俄羅斯的話，那是六十年代影響最大的雜誌之一。畢氏特別強調自然科學的價值，對藝術則採否定態度，自美學的信徒把普希金奉為自己的引路明星之後，這位詩人便成爲他的主要評譯目標。——譯者。

您有着十分純正的審美感情，您不可能是鄭重地說出這句話的——您是故意說的，有目的。我們就來看看這個目的會不會證明您的正當罷。我懂得誇張，我容許戲謔——但必須是真實的誇張，合理意義上的，方向正確的戲謔。假使我們現代的青年人一天到晚都在寫詩，好像古書上所講的幸福時代一樣，那末，我是理解的，我想，我甚至會寬恕您的惡意責難和您的嘲笑；我會想：雖不公允，却很有益！然而，天哪，您攻擊的是誰呀？真是小題大做啊！我們總共只剩下這麼三四位詩人，又都是五十和五十開外的老頭啦，值得對他們生氣麼？作爲一個記者的您的義務，首先就是感受與理解那目前的、必需的、迫在眉睫的事體，您應當把公衆的注意力轉移到益千累萬的其他迫切問題上面去，而您對這些問題倒反視若無睹！在一八六六年抨擊詩人這是老把戲，復古主義！柏林斯基可決不會鑽這樣的牛角尖！我不知道畢莎萊夫當時如何想法，但他什麼也沒有回答我。大概他不同意我罷。

不言而喻，柏林斯基對自己時代和本身使命的瞭解，並未妨礙他那貫徹着他的文章的每個字眼的親切信念，抑有進者：他在批評界的否定性的活動跟他在政治高潮期的社會中所必然選定的那個角色之間，是配合得再好不過了。他所感覺，所想到的一切，他的若干朋友也感覺和想到了；但他所做所寫的一切——却堅決地、嚴格地守着文學的陣地，並

且僅僅在這塊陣地上活動。只有在那封著名的信裏，他這種『……黑夜裏用眼淚和憂鬱哺育起來的』熱情纔流露出來了——如同萊蒙托夫所說的那股火燄一樣。

在這一節裏，我要請求讀者容許我從一篇關於普希金的演講詞中引用一段，這篇演講詞是一八五九年我在一次人數不多的集會上宣讀過的。爲了說明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時代性格，我必須論及果戈理的諷刺，萊蒙托夫的控訴，以及柏林斯基的批評的意義。但我一提到柏林斯基的名字便激起了我的大部分聽衆的公憤。下面就是這一段（我要從稍遠的地方說起——這是不可避免的）：

『可是，在我們的大藝術家（普希金）脫離了那個小小的集團而儘可能地接近人民之後，當他構思自己心愛的作品時，他的靈魂裏便充滿着那些形象，一研究他們，我們自然而然會這麼想：只有他一個人纔能賜給我們以民族戲劇和民族史詩，在我們的社會，我

● 果戈理晚年篤信宗教，還把自己在這方面探求的結果假借與友人哥倫的形式寫了出來。

那就是——一八四六年出版的與友人書簡選萃，在那裏面，他無條件地肯定現存社會秩序，文飾俄羅斯，並大肆宣傳神祕主義；柏林斯基乃于次年發表著名的效果戈理書，一封措詞激烈，帶着濃厚的政治色彩的信札。——譯者。

們的文學中完成一樁即使不算偉大，至少也是很重要的事體。在當時（一八三〇——一八四〇年）歐洲生活的特殊事變與特殊情況的影響下，我們逐漸形成一種信念，一種當然正確，但在這個時代却近乎失之過早的信念，即認為我們不獨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並且我們學會建立一個偉大的、完全能掌握自己的、強大無比的國家，而藝術、詩歌的當前任務，則是做這偉大和這力量的榮譽預言者。跟這信念的傳播同時（也許就是由這信念引起的），出現了整批人物，無可爭辯，他們都很有點兒才能，但他們的才能全帶着矯飾的、華而不實的共同痕跡，這是跟那偉大的、但純然外強中乾的力量（他們正是這種力量的回聲）相一致的。這些人出現在詩歌界，繪畫界，新聞界，乃至戲台上。要不要列舉他們的大名呢？每個人都記得他們——只消回想一下，當沉默的普希金的周圍寂靜無聲的那個時期，人們向誰鼓過掌，歡迎過誰。●狂妄派（我們就決定這麼稱呼它罷）的侵入社會生活中為時並不長久，儘管在文學、藝術界以外的各界（批評家對它們批判得較少）它的影響至今尚未湮滅。它持續得雖不長久——可是多囂張，多猖獗！這個流派當時氾濫得多廣！它的某些活動份子還天真地自命為百年不遇之才呢。雖則如此，但甚至在它表面上獲勝的當兒，人已經可以感到它的不切實際和蒼白無力了——何況它並未澈底征服任何一位

機敏的、有獨創精神的明智之士。這一流派的充滿自信乃至自大的作品讚美着俄羅斯，其實，無論怎麼說它們連一點俄羅斯的氣味都沒有。這些些巨幅的舞台佈景，是不瞭解自己祖國的愛國志士們匆促地、隨便地搭建起來的。這一切都曾經轟動一時，俯瞰同流，這一切都曾自認爲偉大國家與偉大民族的富麗堂皇的裝飾品，然而，衰亡的時刻到底臨近了。但普希金最後幾篇深刻的藝術作品並不是引起這衰亡的原因。縱使它們能當他在世時出版——我們也很懷疑那時候被麻醉了的、被衝昏了頭腦的公衆是否賞識它們。它們不肯迎阿時論，它們能夠取得，而且果然取得了勝利，因爲它們具有一種特出的美，尤其是將這美與力跟狂妄派的殘缺脆弱的夢幻兩相對照的時候；但在最初，正是爲了揭穿這夢幻的

● 那時我決計不列舉這些名字，現在大概每個讀者都能順口說出它們來了——這就是瑪

爾林斯基，庫科利尼克，查果斯金，拜涅吉克托夫，布留洛夫，卡拉蒂庚等人的名字——原註。

查果斯金 (M. N. Zagoskin, 1789—1852)，浪漫主義作家，所著歷史小說尤利·米

羅斯拉夫斯基曾傳誦一時，詳見本書第三篇關於查氏的幾段評述。

布留洛夫 (K. P. Brullov, 1799—1868)，畫家，代表作爲邦貝城之末日。

卡拉蒂庚 (V. A. Karagin, 1802—1858)，悲劇作家，彼得堡劇場演員，浪漫主義舞

台藝術代表——譯者。

激頭激尾的空虛性，却需要另一批工具，另一股更猛烈的力量——拜倫抒情詩似的力量（此類抒情詩在我們文學中也曾一度出現過，不過很膚淺，不嚴肅）需要批評和諷刺的力量。而它們也及時地抬頭了。于是，在藝術界，果戈理與萊蒙托夫開始說話了，在批評界和思想界——則有柏林斯基。

「……從前跟各位談話時，我們說過：我們將來的文學史家對於普希金的出現一定非常重視；但無疑地，我們的瑪科梨——倘使我們命中註定能有瑪科梨這樣的人物的話——也會注意到那個時期的：當時，在那些浮誇、猖獗、裝腔作勢的巨人跟前出現了——一方面，是一位驍騎軍官，社交界的雄獅，從他的口裏，社會破天荒第一次聽到了聞所未聞的無情叱責；②還有一位沒沒無名的小俄羅斯教師，他那篇令人戰慄的喜劇的封面上有

● 瑪科梨 (Macaulay, 1800—1859) 英國歷史家及作家——譯者。

● 請容許我引用當時上流社會的一位貴族婦人的幾句話，她有一次碰見我的時候感嘆道：

『Avez-vous lu la Douma,?』 Qui pouvait s'attendre à cela de la part de Lermontoff! Lui qui venait de dire: (法語：您讀過思德嗎？誰能料到萊蒙托夫會寫出這種東西？他翻說過)「聖母，我此刻在禱告！」 C'est affreux! (法語：這太可怕

了)』——原註。

兩句題詞：「如果臉孔長得醜，就不要怨鏡子！」——另一方面，是一位同樣沒沒無名的，中途輟學的大學生，他居然敢宣稱：我們還沒有文學，羅蒙諾索夫^①不算是詩人，非但赫拉斯科夫和彼得羅夫^②就連傑爾沙文和德米特里耶夫^③也不配做我們的榜樣，最近的偉人們什麼成績也沒有做出來。在這三位幾乎互不相識的活動份子的共同努力之下，不獨我們稱之爲「狂妄派」的那文學流派土崩瓦解了，而且許多其他的陳腐與無價值的東西也都被摧毀了。勝利很快便決定了。但同時，普希金，那個普希金，他的名字對於改革家們

● 按果戈理的欽差大臣的封面標題下有這麼一行：

『如果臉孔長得醜，就不要怨鏡子。』——民間諺語——譯者。

① 羅蒙諾索夫 (M. V. Lomonosov, 1711—1765) 俄羅斯歷史上第一位大學者，精通

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及文學，此外對於俄羅斯語文改革也有過極大的功績。——譯者。

② 赫拉斯科夫 (M. M. Kheraskov, 1733—1807) 十八世紀古典主義作家。

彼得羅夫 (Petrov) 二十年代初期作家。——譯者。

③ 傑爾沙文 (G. R. Derzhavin, 1743—1816) 十八世紀最傑出的抒情詩人。

德米特里耶夫 (I. I. Dmitriev, 1760—1837) 詩人兼寓言作家，十八世紀末葉其

族感傷主義代表。——譯者。

是那麽親切，是被他們用那麽洋溢的愛來環繞着的——他的影響却縮小和削弱了。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爲之效力的那理想（盡人皆知，果戈理一直到死都厭棄它，拒絕它的）竟未能跟普希金的理想符合，這使得他們自己也很苦惱。事物的力量比任何特殊個人的力量都強，恰如我們的共同意向比我們私人的愛好要強一樣。純詩歌的時代正像「狂妄派」的美文時代似的，成爲過去了。於是我們踏進了批評、論戰、諷刺的時代。當我們想起馮維辛與諾維科夫的時候，我們也可以用「回復到」這三個字來代替「踏進」。凡有留心各民族的生活的人，都知道往前奔馳的歷史車輪有時是會來這麼一個「向後轉」的一個社會，假如它因爲突然意識到本身的缺陷而大爲震驚，並預感到將來還有別的更痛苦的幻滅——這幻滅是變成事實了——的話，它一定會熱切地去傾聽那些新的意見。

● 馮維辛 (D. I. Fonvizin, 1745—1792) 十八世紀著名喜劇作家，其代表作爲旅圖長及未成年者。

● 諾維科夫 (N. I. Novikov, 1744—1818) 諷刺作家兼教育家。——譯者。

● 當我宣讀這篇演講詞時，距一八五六年的巴黎和會尚不及三年。——原註。（指一八五三年五六年克里亞戰爭後的和會。在這次戰爭中，經濟落後的俄羅斯的弱點暴露無遺，結果被英法，上可其三國聯軍打得大敗，簽訂了俄國的巴黎和約。——譯者附註。）

不過它所願採納的只限于能夠滿足它的新要求的庫科利尼克的托克瓦托·塔索和神手固然全像肥皂泡似的消逝了，連青銅騎士也無法跟外套同時受到讚賞呢。」

接着我就十分詳盡地論述果戈理與萊蒙托夫的特徵，而以如下的幾句話作爲結束：

「獨立的、批判的、控訴的人物起來反對欺詐，反對庸俗——當時哪個社會階層不受「庸俗」的支配呢？——反對那遍及各處的虛偽，和並無令人服從的合理權利的、不公平的法律……」

然後我這樣繼續下去：

「現在請求各位允許我們來談談第三位人物罷，我們知道他的名字在各位聽來是不太順耳的。我們要談柏林斯基。一提起這個名字，就會聯想到他那股熱情，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也會聯想到他的豐功偉績。他的話至今還是活生生的，我們不能容許俄羅斯人正當目前貪婪地閱讀他的時候會一方面敬愛他，另一方面却又完全誤解了他。我們之所以提

◎ 青銅騎士是普希金在一八三三年十月所作長篇敘事詩，普氏逝世後纔發表于一八三七年第一期現代人上。

外套是果戈理的中篇小說，一八四〇年作。——譯者。

及他，並非因為我們跟他中間的私人友誼關係；我們希望各位能注意他的事業的本質。這本質叫做「理想主義」：柏林斯基是最好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那存在於三十年代初葉，而它的遺跡迄今還歷歷可見的莫斯科小組^②所皈依的便是理想主義。處在德國哲學思想（這種思想跟莫斯科之間的經常聯繫至為顯明）強烈影響之下的這小組相當於一位特殊的歷史家。這便是柏林斯基一直到死都沒有放棄的那信仰——他所效力的那理想——的源泉。爲了這理想，柏林斯基宣佈了普希金的藝術意義，並指出他作品中缺乏社會因素；爲了這理想，他纔歡迎萊蒙托夫的控訴和果戈理的諷刺；也爲了這理想，他纔粉碎了舊的權威，我們的所謂「榮譽」，他既沒有可能，也沒有興致從歷史的觀點去考察他們……」

① 當時他的全集的頭幾卷剛剛出版。——原註。

② 指三十年代初莫斯科進步青年學生研究科學、哲學及文學的小組，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坦格羅奇小組和赫爾岑——奧加略夫（Ogarov）小組。自一八三五年赫爾岑與奧加略夫被判流刑，三七年秋斯坦格羅奇出國治病，三九年底柏林斯基移居彼得堡，四〇年夏巴枯寧亡命異邦後，這些小組亦隨之解體。到了四十年代初，由於對俄羅斯的理解不同，所謂的「三十年代的青年」便分成互相敵視的「西歐派」與「斯拉夫派」。——譯者。

或許有些讀者覺得奇怪，爲什麼我要用「理想主義者」這個名詞來說明柏林斯基的特徵。關於這，我的解釋是，第一，在一八五九年的時候，我們還不可能找到適當的名稱去稱呼許多事物；其次，當時與會的人都認爲柏林斯基的名字跟「冷評家」跟狂暴的唯物論者等等的概念是密切地聯繫着的，因此在他們面前宣稱他是「理想主義者」使我——我坦白地承認——感到很大的滿足。何況這稱呼本來就很適合他。柏林斯基是理想主義者，也恰如他是否定論者一樣；他否定，正爲了理想。這理想具有十分明確單純的性質，雖然從前以至如今它的名稱都是五花八門的：科學，進步，博愛，文明——最後，西歐。擁護政府，同時對他懷有惡意的人的甚至說這理想就是革命問題不在名稱，而在本質，這本質是如此明瞭與無庸置疑，我們大可不必爲它多費筆墨；這兒不可能引起什麼誤解。柏林斯基把自己整個兒獻給這理想，爲它服務；他的全部同情，全部活動都屬於「西歐派」——正像他們的敵人所稱呼的。他所以是一個西歐主義者，不僅因爲他承認西歐科學，西歐藝術以及西歐社會制度的優越性，而且因爲他深深地相信：俄羅斯必須吸取西歐的一切勞績纔能提高它本身的力量和本身的地位。他相信我們別無救藥，除非循着彼得大帝——其時

斯拉夫派正把他罵得狗血淋頭——指示給我們的那條道路走去。●接受西歐生活的成果，把它們應用到我們的生活中來，使之適應我們的自然，歷史和風土的特殊性，但又對它們抱着無拘束的批判的態度。——照他的理解，這樣我們最後纔會達到獨立自主（他對于獨立自主的重視遠在人們通常所猜想的之上。）柏林斯基是個道地的俄羅斯人，甚至是個愛國志士——當然並非M·N·查果斯金似的愛國志士；祖國的福祉，它的偉大，它的榮譽，全在他心裏激起了深刻強烈的反應。不錯，柏林斯基愛俄羅斯；但他也熱愛文明與自由。把這些他認為的最高利益融而為一——這便是他的事業的全部意義，便是他的願望。有人斷定他只是用一知半解之徒的逢迎的、盲目的恭順態度膜拜西歐——這表示他們根本不瞭解他；何況普通一知半解之徒的過錯並不在他們的恭順。柏林斯基之所以一想起彼得大帝來就生出敬崇之念，並公然承認他是我們的救主，還因為他發現我們陳腐

● 柏林斯基時常在朋友當中朗誦列夫·普希金（詩人普希金的兄弟）的詩章彼得大帝，

並且懷着特別的感情吟出其中的幾行，在那兒，改革家被描寫成爲這樣一個人，他

「用那強勁的手，

握着——靈靈惶惶的子孫前導。」——原註。

的社會制度與民間組織早在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維奇時代就有了無可置疑的崩潰跡象，從而，他不相信我們的機構會像西歐的那樣，得到正當的、正常的發展。固然，彼得大帝的事業是憑藉暴力的，是最近所謂的 Coup d'état（法語：政變）式的；但正由于這一連串強制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我們纔擠進了歐洲各民族的大家庭。諸如此類的改革至今還很必要。近來的許多實例可以證明這意見的正確。我們在那大家庭裏已經佔了一席怎樣的地位——歷史自會指出這個；可是我們一直到今天都在走着，並且應該走着（當然，斯拉夫派的先生們是不同意這種說法的），應該走着一條跟那本來或多或少成長了的西歐各民族不同的路子，却是毫無疑義的事。

但柏林斯基的西歐主義信仰絲毫也沒有削弱他對於俄羅斯的一切的理解與感受，也沒有改變那一道在他整個身體裏滔滔奔瀉的俄羅斯激流——他的每一篇論文都可以作證。不錯，他比任何人更理解俄羅斯的本質。他不承認我們的偽古典派和偽民族派。

● 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維奇 (Alexis Mikhaïlovich, 1629—1676) 羅曼諾夫王朝

第二位沙皇，在位年代爲一六四五——七六，一向被稱爲「最溫和的阿列克塞·米哈依

洛維奇」的——譯者。

的權威，打倒他們，而同時，他却能比一切人更深澈，更正確地賞識並且說明我們文學作品中真正獨創的、珍奇的東西。無論誰的耳朵也不及他的靈敏，無論誰也不能像他那樣敏銳地領悟我們語言的和諧、美麗；詩的形容詞與典雅的語句會立刻使他感動，聽他朗誦普希金的詩篇或萊蒙托夫的姆采里^②時，他那淳樸的、略嫌單調的，但却熱情而真摯的聲調，確實是一種享樂。散文，特別是他所喜愛的果戈理的文章，他唸得較差，他的聲音很快就微弱下來了。

作為批評家的柏林斯基還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他永遠像英國人所說的“earnest”（懇摯）他決不用戲謔的態度去對待他研究的對象，讀者或他自己。他一定會厭棄最近那麽流行的冷嘲熱諷，認為那是無價值的輕佻或怯懦的。大家都知道，愛嘲笑的人

① 請參看他論述普希金、果戈理和科里卓夫的文章，尤其是論述民歌與民間史詩的文章。在當時語言學和考古學資料不足與貧乏的條件下，他竟能深刻透澈地研究了人民精神及人民創作，這使得讀者大為驚異。——原註。

② 姆采里，或譯童僧，萊蒙托夫一八三九年所寫的敘事詩。——譯者。

人往往連自己也不太明瞭他所嘲弄和諷刺的到底是什麼，在任何場合他全可以利用這塊帷幕來掩飾他的信念的動搖與模糊。人們嗤笑，打哈哈……可是，你猜猜他的話的意思，研究研究它罷，他這話是對什麼而發的？也許他所嘲笑的是確實值得嘲笑，也許他只是爲嘲笑而嘲笑，「露露牙齒。」人家會跟我說：有時只能暗示真理，而用嘻笑的口吻就比較容易說出它……難道柏林斯基在世的那個時代是能夠暢所欲言的麼？但他並未乞靈于冷嘲熱諷，乞靈于「心愛的」口哨聲。和譏諷。用那種「口哨聲」在某一部分公衆中引起的同情的笑，跟森科夫斯基的缺德的諧謔所引起的笑相去並不遠……粗野的挪揄與打諢到處風行，遺憾得很，這種嗜好竟是俄羅斯人的特色，這是不該寬恕的。粗魯的笑聲的討厭與有害，也跟它的惡毒一樣。

柏林斯基常說他本人不擅戲謔；他的諷刺非常呆笨、拙劣，它立刻變成了正面的辱罵。在談吐當中，恰像執筆爲文時那樣，他並不僞語風生，他沒有法國人所謂的 *esprit*（機智），也不以巧妙的辯術炫耀于人；但他的談話却蘊藏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種正直而執拗的思想，而表現的方式又那麼別緻，以至聽者終于不能不爲之折服。雖則完全沒有

● 指現代人的諷刺劇刊口哨，該刊出版於一八五八年，主要由杜勃羅留波夫負責。——譯者。

通常所謂的辯才，並且對於『藻飾』和修辭他顯然既無天稟，又無興趣，但柏林斯基却是最雄辯的俄羅斯人之一，假如『雄辯』這兩個字是意味着一種說服的力量，即是，比方講罷，雅典人在伯里克里斯●身上所認出的那種力量——據說他的每篇演講都能打入全體聽衆的心坎——的話。

如所週知，柏林斯基不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何況，照他整個思想方法的特質說，他也不可能這樣來理解藝術。我記得有一次，他帶着多麼可笑的憤慨神情在我面前攻擊普希金（不消講，普氏那時已經去世了），因為他的詩人與庶民●裏有這麼兩行：

『灶上的沙鍋于你避珍貴些
你可以用它給自己煮吃的！』

● 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495—429 B.C.) 雅典政治家。——譯者。

● 詩人與庶民即詩人與羣衆，普希金一八二八年所寫的詩篇，這兒引用的兩句是詩人對庶民說的話。——譯者。

「當然」柏林斯基眼睛冒火，從一個角落跑到另一個角落，重複地說：「當然還珍貴些。我非但用它來給自己，而且還要給我的家屬和其他的窮人養吃的；在欣賞一尊塑像之前——哪怕它比菲狄亞斯的阿波羅[●]更好——我的權利和我的義務是餵飽我的親人，也餵飽我自己，我憎惡一切憤激的公子哥兒和小詩人！」但柏林斯基是聰明的，他有豐富的常識，他不會否定藝術，他不獨瞭解它的重要與意義，並且瞭解它的自然性，它的生理現象似的必然性。柏林斯基認為藝術是人的個性的根本表現之一，是我們的自然法則（這說法則是日常經驗教導給我們的）之一。他不容許僅僅為藝術而藝術，好像不容許僅僅為生活而生活那樣；無怪他是個理想主義者了。一切都應該為一個原則服務，藝術一如科學，也要為這個原則服務，但它所採取的方式是別緻的，特殊的。說藝術乃是大自然的翻版的那種真正幼稚，同時並不新鮮的陳腐解釋，在他是既不反對，也不重視；而說現實的蘋果勝似畫中的蘋果的論調[●]，也不會影響他，因為這種聲名狼藉的論調是沒有力量的一個

● 菲狄亞斯 (Phidias, 500? — 432? B. C.) 希臘彫刻家，阿波羅 (Apollo) 係菲氏所作

立像，發揮男子之美者——譯者。

● 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名作藝術對現實之美學的關係（一八五五年作）中所宣示的現

實主義的美學。——譯者。

吃飽了的人就會不以爲然。我再重複一遍：柏林斯基認定藝術是人類的一個正當活動範圍，猶如科學、社會、國家一般……但他也向藝術，恰似向人類的一切活動，要求真理，純正的生活真理。然而，在藝術領域之內，他所熟悉的只有詩歌、文學，他不懂繪畫，對音樂也無甚興趣。他深知自身的缺陷，所以從不闖入那些禁地。果戈理論伊凡諾夫和布留洛夫的文章可以作爲前車之鑑：當一個人越出了自己的研究範圍時，他會信口胡謔些多麼可恥的謊言和多麼肉麻的虛僞的話來。柏林斯基所記得的唯一歌曲是惡魔羅勃爾裏面的惡魔合唱曲，在心緒特別好的時候，他會用低音唱出這支魔鬼歌的魯賓尼雅（Rubinye）的歌唱很教他感動，但他重視的並非音樂的完美，倒是那悲壯激昂的精神和戲劇性的表情。一切富於戲劇性的，帶演劇風味的東西都能深深地打動柏林斯基的心，使它燃燒。他那些有關莫恰洛夫和史遷普金總之是，有關演劇的論文，無不充滿着熱情：從那兒可以看見

● 請參閱本文末尾附錄一——原註。

● 伊凡諾夫（A. A. Ivanov, 1806—1858）著名畫家——譯者。

● 惡魔羅勃爾（Robert le Diable）德國作曲家梅耶白爾（Meyrebeer）所著歌劇——譯者。

出飾哈孟雷特的莫恰洛夫的演技給予他的印象，他回憶着，莫氏如何在演出這個悲劇的某一場面時，由于喜恨交集而氣喘吁吁地對犯罪的國王說：

「鹿兒被箭頭射傷了……」

有一個原因，往往使柏林斯基避免談及演劇和戲劇文學，尤其是跟很熟識的人在一道的時候：他害怕人家向他提起他那篇脫稿於莫斯科，刊載在觀察家上的喜劇五十歲的舅舅。這個喜劇確實是十分拙劣的作品，它屬於最壞的一類——屬於眼淚汪汪地談道德的，感傷勸善的一類；主角是一位忠厚長者，他迷戀着自己的甥女，但畢竟為了一個青年情敵而犧牲了自己的愛情。這一切全寫得不够緊湊，文字也生硬死板……柏林斯基

● 莫恰洛夫 (P.S. Mochalov, 1800—1848) 莫斯科的著名悲劇演員，浪漫主義舞台

藝術的代表。史遜普金 (M.S. Shepkin 1788—1863) 莫斯科小劇場的名演員，俄

羅斯現實主義舞台藝術的奠基人，跟屠格涅夫、柏林斯基、赫爾岑等的私誼甚深。譯者。

● 觀察家即莫斯科觀察家，一八三五至三九年間在莫斯科出版的雜誌，最初的編輯是S.

P. 謝維略夫 (Sheviev) 教授，三八至三九年間則為柏林斯基，該刊本來沒沒無名，自

柏氏主編後始成爲當時最好的雜誌之一。譯者。

毫無「創作」才能。這喜劇，再加上一篇論門策爾的文章，^①對於柏林斯基，猶如阿奚里的腳踵。在他面前提到它們，便無異侮辱他，折磨他。他尤其不能饒恕那篇關於門策爾的論文。他承認自己的喜劇是一種美學、文學上的錯誤，但在那篇論文裏所看出的錯誤却嚴重得多了。論門策爾的文章是在那種瞬息即逝的心情中寫就的：他急躁不安，同時又朦朧地祈望着從漂渺的理想境界過渡到什麼積極的、實際的境界去，彷彿當時存在的一切還能具有實際意義，還能教正直的人心滿意足似的！自然的、可憐的柏林斯基並不理解門策爾先生是一隻怎樣的鳥兒，他只是用純粹臆斷的、抽象的觀點來研究這個人物……在這種場合，貧乏的實際知識也殘酷地作弄了他……他還有一篇紀念波羅金諾戰役的短文。^②

① 五十歲的舅舅的全稱是五十歲的舅舅，又名：奇怪的病，五幕喜劇，一八三九年發表。——譯者。

② 門策爾（Menzel），德國文學史家及現實主義批評家。柏林斯基論門氏的文章題名門策爾，歌德的批評者，一八四〇年由祖國紀事發表。——譯者。

③ 阿奚里（Achilles），荷馬所作史詩伊里亞特（Iliad）中之主人公，其母持之以愛於斯蒂克斯（Styx）冥河中，俾刀鎗不能傷其身，惟所持之踵部未被水浸，後為巴里士（Paris）以箭射中其踵部而死。——譯者。

我曾經對他提起它……他用雙手掩住耳朵，身子向前緊傾着，左右搖幌着，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但他爲浮誇的愛國主義所苦的時期並不長久。總之，柏林斯基最好的論文都是當他的事業開始和將近結束的時候寫出的；中間那段時間（約莫有兩年）他滿腦子的黑格爾的哲學，但又食而不化，僅僅狂熱地吞噬着它的原理，它的著名命題和術語，它的所謂“Schlagwörter”（德語：暗號。）其時他所喜歡的名詞術語實在太多，他簡直弄得眼花撩亂了！連柏林斯基也舉起時髦來啦！然而這個浪潮很快就消退了，好的種子却留下來了，於是柏林斯基筆下的俄羅斯文字，這光榮、明瞭、精確的文字，又帶着它那全部雄渾而真純的樸素性出現了。柏林斯基的論文可以說盡是些即興之作，寫的時間則在每個月的最後幾天；他攤開活頁稿紙，便站在寫字台面前！●振筆疾書（他的字跡是粗大的）根本無需刪改。他沒有工夫去講求風格，去推敲和思索每個字句，因之行文未免略嫌贅冗，但決不是

● 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破命侵俄，於九月初進抵距莫斯科一百二十公里之波羅金諾（Borodino）

與庫圖索夫將軍統率之俄軍發生激戰，俄軍折損過半，終於七日晚往莫斯科退却，史稱波羅金諾之役。柏林斯基論這次戰役的文章題名波羅金諾年祭，一八三九年作於莫斯科刊

在同年秋天的一期祖國紀事上。——譯者。

囉囉嗦嗦；——應當承認，我們雜誌批評欄中的囉囉嗦嗦的作風乃是已故的畢莎萊夫一手倡導起來的；柏林斯基的論文畢竟還是文學作品，並沒有變成散漫無章的聊天或者重三複四的陳詞濫調——這種陳詞濫調總有點兒像學生的作文，不管它如何充滿了熱情。

柏林斯基曾經在一家雜誌社供職，那位錙銖必較的發行人加給他的負擔多麼沉重，是盡人皆知的事。什麼作品不要他評論——詳夢書呀，食譜呀，數學書呀，雖然他對於這類東西其實完全是外行！但當雜誌準時於每月一號出版了之後，就可以休息幾天，那時他是

① 如果好奇的讀者希望確切地知道當時的人們窮究哲理到了怎樣的地步，那末，我要奉勸他去查查一八四〇或四一年某期祖國紀事的雜誌欄裏一篇短文，但它並非柏林斯基，而是發行人自己寫的，它爲伊斯拉夫（譯者附註：伊斯拉夫是伊力山大·赫爾岑的筆名。按伊斯拉夫〔Iskander〕爲伊力山大〔Alexander〕一字的阿拉伯譯音。）用過的一句話（彷彿是『拿破侖是兩脚朝天的查理大帝』罷）辯護，因爲那句話曾經被另一個雜誌取笑過。尤其可笑的是，這篇妙文的作者竟儼然一本正經，甚至毫不懷疑他沉迷到哪步田地了！——原註。

② 當時很多作家都有站邊寫稿的習慣，例如普希金就是。——譯者。

怎樣享受這些假日，如何逍遙自在啊，他跟朋友們聊天，有時也玩玩紙牌——一個戈比克輸贏的「Preference」！他的牌術並不高明，但玩時却帶着他所特有的那種動人的誠摯和奇異的神情——他無論做什麼事全是這樣的！記得有一次我跟他鬪牌，不論錢，而是鬪着玩兒的；他贏了，得意了……但猝然之間却輸掉了四張牌。我的柏林斯基比秋夜還要陰沉，他低着頭，彷彿被判了死刑。他臉上的痛苦與絕望的表情是那麼真誠，我終於忍耐不住，叫起來了：「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人，如果這麼苦惱，不如把紙牌全丟了罷！」「不，」他皺起眉頭盯着我，用低沉的聲音回答道：「一切都完了，不過，要是用方塊（菱形牌）做王牌，我準會贏的！」我敢保證，在這一瞬間，他對自己所說的話確是深信不疑的。

午飯以後，我經常上他那兒去談心。他的寓所在楓塘卡的一座樓房下層，離阿尼契科夫橋不遠，是幾個陰暗的，相當潮濕的房間。我不能不重復一遍：那是一個苦難的時代；如今的青年人再也不會嘗到那種滋味了。請讀者自己去判斷罷：早上，人家也許會把你的稿樣退回來，滿紙都是紅墨水畫的槓槓和塗改的痕跡，好像被血染過了一般；也許你還得跑到審查老爺那兒去，作種種徒然的、委屈的解釋與辯明，恭聆他那專斷的、往往是冷嘲熱諷式

的判決……在街上，你會碰見布爾加林。先生或者他的朋友格萊契。先生，一個將軍，甚至並非主管官，而只是一個普通的將軍，也會辱罵你，或者（這就更糟）誇獎你……你默默地環顧一下罷：賄賂公行，農奴制度像磐石似的屹立不動，各地只有兵營，而不見法庭，謠言紛傳，說是許多大學要被封掉了，不久學生名額便急銳地減少，每所大學最多不過三百人，出國旅行是不可能的，連訂閱有益的書報也算違禁，整個所謂學術、文藝界經常被陰霾籠罩着，還要加上鬼鬼祟祟的告密，青年當中沒有普遍聯繫和共同興趣，大家都恐懼而

● 在接見我們的審查官當中最幽默的是審查官P——就是那位常說「天哪，我連一個字母都沒刪掉，我要刪除的只是作品的精神」的。有一次，他眼睛凝滿感情地望着我說：「您希望我不要塗改，可是請您自己去判斷罷：我若不塗改，一年就可能損失三千盧布，而塗改一下——誰會因此而傷心呢？一個字的有無——有哈關係？我怎麼不塗改呢？」上帝保佑您罷！」——原註。

● 布爾加林（F. V. Bulgarin, 1780—1859）記者兼作家，原係自由主義者，十二月黨革命後變成御用文人，並為政府作密探，一八二五年起與格萊契合辦報紙北方蜜蜂，無條件地歌頌沙皇一切措施，曾能受普希金和柏林斯基嘲罵。——譯者。

● 格萊契（N. I. Grech, 1787—1867）記者，作家兼教育家，亦係當時著名的文化特務。——譯者。

卑屈，不敢說一個『不』字！這時你若來到柏林斯基的寓所，第二、第三位朋友也來了，開始談起天來，心裏便比較輕鬆了；話題大半是通不過審查（照當時的意義說）的，但其實並未舉行政治討論，因為任何人都明瞭這類討論的無益。我們平常所談的總不外哲學、文學、批評、美學，或者社會問題，但很少涉及歷史。有時談得興趣盎然，甚至慷慨激昂，有時却略嫌膚淺與輕浮。柏林斯基雖則生性莊重，而且真正高潔，可是他的舉動却常常像個小孩：一聽到他心愛的句子，比方講，一聽到喬治·桑^①或P·萊路^②——其時他正交紅運，人們在秘密（！）通訊中稱他爲彼得·利日——作品中的某一段時，他會立刻請求別人把這一段抄給他，此後就愛不釋手了。但這一切全很適合他，這兒顯現出了一個活生生的俄羅斯人。有時一件小事也會刺激他。有一次他將歌德的小書東西詩集（“Westöstlicher Diwan”）帶在自己口袋裏，足足有六個禮拜之久，即是因爲我偶然給他從那裏面引用了兩句詩：『當別人活着的時候，我還能活麼？』他便在以介紹歌德詩作聞名的翻譯家A·N·S 跟前重複這幾句詩，並譴責歌德的利己主義；那人很懷疑所引用的句子是否正確。

① 喬治·桑（George Sand, 1804—1876）法國女作家。譯者。

② 萊路（Leroux, 1797—1871）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對喬治·桑影響甚大。譯者。

大概還嘲諷過柏林斯基的輕信，于是他就向我要了一本東西詩集，經常帶在身邊，以便碰到S時刺他一下……但教柏林斯基大為掃興的是，他此後竟再也沒有遇見過S。在他一生的最後兩年中，由于那日趨嚴重的病勢的影響，他變得異常敏感，還害了憂鬱症。

有四個冬季——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六年——我常跟柏林斯基見面，尤其是一八四七年正月以前，當我決意出國久住當現代人已經創辦起來，即是說，已經向故世了的P·A·普列特涅夫承頂過來的時候，我們中間過從更為密切。這個雜誌的創辦，歷史極富教育意義……但此刻還很難正確地記述它，因為這勢必要掀起一些舊的論爭。我只須說出這一點就夠了：柏林斯基竟被逐漸地，異常巧妙地從雜誌社排擠出去了，而這個雜誌本來是為他創辦的，是用了他的令名作號召，這纔得到許多撰稿人的支持，終年充滿着洋洋大文的。（他還訂了一個大計劃，打算用這些文章來出一套叢書呢。）爲了現代人，柏林斯基不惜跟祖國紀事斷絕關係，但他在新的雜誌社，也像在從前那家雜誌社一樣，只佔着一個不相干的撰稿人兼雇員的地位，雖則他具有做主人的充分權利。我手頭藏有柏林斯基這個時期給我的一些珍貴的信札，其中的若干片段讀者會在後面看到的。至于講到我自

己，那末應當說，在最初對我的文學活動表示過歡迎之意而後，他很快就——這是十分公平的——冷淡下來了：他不能鼓勵我去寫當時我所醉心的短詩與長篇敘事詩。再則，不久我自己也認為繼續寫這類習作是毫無必要的了——于是我決計完全捨棄文學了。不過 I·I·巴納耶夫因為現代人第一期的雜誌欄缺稿，請求我寫點什麼，我就給他留下一篇題名霍爾與卡里涅奇的短文（「選自獵人日記」幾個字也是 I·I·巴納耶夫擬定和添上的，目的在希望得到讀者的原宥。）這篇短文的成功鼓舞了我，使我接連寫出其 他各篇；我又回到文學上來了。但讀者將會從柏林斯基那些信札中看出：儘管他比較滿意我的散文作品，却並未對我寄與特殊的厚望。柏林斯基時常懷着仁慈的寬恕和熱烈的同情去獎掖他認定有點才氣的初學寫作者，扶助他們跨出頭幾步；而對於他們的更進一步的嘗試，他的批評却很嚴厲，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他們的缺點，貶斥和讚揚都同樣公正。然而，在最初那個時期，他的態度却往往近于溫柔，他非常親切，幾乎是令人哀憐的，幾乎是可笑的。當他讀到陀思妥也夫斯基先生的窮人時，他簡直高興得發狂了。「是的，」他驕恣地說，彷彿自己完成了一樁豐功偉績，「是的，親愛的，我要告訴您——鳥兒不算大，」他把一

隻手伸在離地板將近一阿爾申●高的地方比擬着：『鳥兒不算大，——可是爪子利得很！』我不久以後便見到陀思妥也夫斯基先生，發現他竟是一個高過中等身材的人——無論如何比柏林斯基本人要高，那時我多麼驚異啊！但慣于用父親般的溫柔對待初露頭角的天才的柏林斯基對他卻像對兒子似的，對自己的『小寶寶』似的。正是同樣的情形，一八四三年夏天，當我跟他認識的時候，他對涅克拉索夫厚愛有加，處處推崇他，提拔他：

恰如一切有着燃燒般的靈魂的人，一切熱情家那樣，柏林斯基是相當急躁的。他決不承認，尤其在他激怒的時候，敵人的見解中有半點真理，而且憤懣地避免談及他們的見解，但當他發現自己的主張錯了時，他也會同樣憤懣地放棄這主張。有一次我對他說，他這麼做是很可能被人『擊敗』的，但他却笑了之，——在他看來，真理是太寶貴了，因此他不能固執到底。唯獨對於莫斯科的一個集團，即斯拉夫派，他可是一輩子都抱着敵視態度，因為他們跟他所喜愛所信仰的一切剛剛針鋒相對的原故。總之，柏林斯基善于憎恨——
he was a good hater (英語：他是善于憎恨的人)並且用整個心靈去輕蔑那該受輕蔑

● 一阿爾申等于〇·七二一公尺強。——譯者。

的。萊布尼茲在什麼地方說過，他幾乎對任何人都加藐視。這對於一位經常在莫測高深的沉思冥想中過日子的哲學家，是容易瞭解的，值得稱道的，然而我們的兄弟却是平凡的，腳踏實地的人，他決不能昇華到這種悠閒沖淡，這種偉大的恬靜境界裏去。法捷依·布爾加林之流在我們心頭所喚起的輕蔑的情感保證和增強了我們的道德意識，我們的廉恥心。柏林斯基總是毫不隱諱地承認自己的過失：他心裏沒有一點妄自尊大的痕跡。『哪，我又瞎扯了一陣！』他時常微笑着說。——這是多好的性格！柏林斯基並不過份重視自己和自己的才華。他的謙虛是真摯的，誠篤的；但『謙虛』兩個字用在這兒還不恰當：照他的意思，他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他還為此鬱鬱不樂呢；但我們已經不能向他要求更多了。另一方面，在他看來，再也沒有什麼比他所支持的那事業，比他所擁護和啓發的那思想更重要，更崇高的了：在這兒，他準備痛恨任何人——誰要落到他的手裏，誰就倒了霉！這兒也顯示着他的大勇——跟他的身體及神經絕不相稱的決死之勇：在這兒，他準備犧牲一切！雖然他這麼暴躁——這麼容易動感情……不！無論從前或以後，我都沒有碰見過像他那樣的人物。

一八四七年夏天，柏林斯基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出國。在西利西亞^①州的查利茲布隆，一個以治療肺結核的鑛泉聞名的小鎮上，我跟他同住過幾個禮拜……鑛泉給他的裨益很有限。在查利茲布隆的時候，著名的與友人書簡激惱了他，於是他給巢戈理寫了那封信……後來我又在巴黎碰到他。他在那兒進了醫院，向一位名叫提拉·戴·瑪利莫魯的肺病專科醫生求治。許多人認為那是一個庸醫，但他却使柏林斯基完全康復了。咳嗽停止了，臉上的菜色消失了……然而他太急於回彼得堡，終致前功盡棄^②。怪事！他在外國竟會感覺寂寞，這便是促使他趕回俄羅斯的原因。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俄羅斯人，一離開俄羅斯就會衰頹下來，彷彿魚兒離開了水似的。我記得，他初次看見巴黎的協和廣場時，立刻問

● 西利西亞 (Silesia)，普魯士的一州——譯者

● 這裏還有一個例子，足以說明柏林斯基爲人之有趣。當他要離開巴黎時，朋友們給他請了一名嚮導，伴送他到柏林；但臨走前幾分鐘忽然發生了什麼誤會，柏林斯基只好單獨上路。

『請想想我的景况罷。』後來他給巴黎一位友人寫道，『走到比利時邊境，他們董問我，而我什麼也不懂，只得瞠目以對。幸好，稅關的負責人大概看到我傻頭傻腦，像個聖徒，——便讓我派司了。』——原註。

我：『可不是？這可不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一個廣場麼？』待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却感嘆道：『唔，很出色的；我知道這個——但是，罷了罷了，不去說它了！』於是把話鋒轉向果戈理身上去了。我提醒他說，在革命時代，斷頭台就擺在這個廣場上，路易十六被斬首也是在這兒，他環顧四周，說了一聲『啊！』——便回憶起塔拉斯·布爾巴裏面奧司大普[●]被處死刑的場面來了。柏林斯基的歷史知識極其貧乏，他對於那些發生過歐洲生活中的大事的地方不能特別感到興趣；他不懂外國語，因此無法研究當地的人民；無謂的獵奇、觀光、*ordure*（法語：遊蕩），又跟他的性格不合。音樂和繪畫，如前所述，也不大使他動心；而這麼強烈地影響着我們許多同國人的巴黎的種種，却適足以擾亂他那聖潔的、近乎禁慾主義的道德意識。結果他只默了幾個月……就已經厭倦了，冷淡下來了……

我不知道能否說說柏林斯基對女性的態度。他本人幾乎從來沒有涉及這個風雅的問題。通常他不大願意多談自己和自己的過去之類。我屢次把他引到這個話題上來，但他老是設法避開；他彷彿害羞，彷彿不懂爲什麼還有閒情逸致來談論私人瑣事，當面前擺着

● 塔拉斯·布爾巴，果戈理所作中篇小說，奧司大普是它的一個男主角。

這許多更重要更有益的話題的時候！如果他也曾涉及自己的過去的話，那末，他差不多總是從一種幽默的觀點出發的，例如，他對我講過，當他從大學裏被開除出來，確實無以為生之際，他如何爲了二十五個紙盧布而着手翻譯坡利·戴·科克的一個長篇小說，在翻譯中犯了怎樣的錯誤！他顯然體驗過可怕的貧困，但事後他可從不高興向朋友們描述和渲染它，好像經歷了這種艱苦鍛鍊的人所常做的一般。他不屑于宣揚這類事情，因爲他有着過多的崇高美德，也許，過多的驕傲……驕傲和妄自尊大完全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照柏林斯基的瞭解，像他那樣的外貌是絕對無法博得女人的青睞的；他對這點深信不疑，當然，這個信念更加助長了他在跟她們交往時的羞怯和拘謹。我有理由推測：柏林斯基從沒有被女人愛過，雖然他有着一個熾燃善感的靈魂，雖然他很多情和熱心，並且畢竟是當時的一個頭等人物。他不是先經過戀愛纔結婚的。年輕的時候他愛過一位姑娘，特威爾地方的地主B——n的小姐；這是一個富於詩意的人兒，但她却愛着別的男子，加之不久就逝世了。●柏林斯基跟一位平民出身的女孩中間也有過一段十分離奇悲惻的瓜葛；我還記得他所說的，關於她的斷片的淒涼故事……它給予我的印象很深刻……可是這件事也終於失敗了。他的心默默無聲地消沉下去了；他只能借用詩人的話感嘆道：

『嗎，蒼天！假如能讓（哪怕一次也好）

這團變火自由燃燒……

我就不再頹唐，不再憂傷，

並將含笑而死！』

然而人的幻想決不會實現，悲傷也無濟於事。誰要是拈不到好的號頭——就拿了自己的空闊走開去罷，正不必向別人傾訴。

但我不能不在這兒提提，雖則只是順便帶一筆，柏林斯基對一般婦女，特別是對俄羅斯婦女，對她們的境況、她們的將來、她們的絕對權利、她們所受的教育的缺陷，一言以蔽之，對今天的所謂婦女問題——對這些的精闢而公正的見解。尊重婦女，承認她們的自由，她

● 柏林斯基曾經愛過特威爾地方的地主小姐亞力山特拉·亞力山特羅芙娜·巴枯露娜（1810—1883）『不久就逝世了』的是她的姊妹柳波芙·亞力山特羅芙娜（一八三

八年去世）斯坦格維奇的愛人。在這兒，屠格涅夫顯然把兩件事混淆了。——譯者。

們的不僅在家庭中，而且在社會上的重要性——只要一涉及那個問題，他處處都表現着這種態度——固然，他不會像現代的人那樣說得大胆、響亮和巧妙。

時常聽到一句話：某人死得真合時，真湊巧……把這句話應用到柏林斯基身上來，是再恰當不過了。對的！他死得真湊巧，真合時！臨終之際（柏林斯基逝於一八四八年五月）他還來得及親眼看見他衷心酷愛的希望的勝利，而沒有看到它的最後幻滅……如果他還活着的話，他會遭遇怎樣的苦難啊！盡人皆知，警察天天都在調查他的健康狀況，他的輾轉痛楚的情形……死亡使他免除了一場嚴重的災厄。何況他的身體也確實不成了……爲什麼還要拖延呢？

『再掙扎一次——我就跨天了！』（拜倫）

雖然如此，但我們生者却難免要聯想到當前的現實，並且無法抑制心頭的哀痛的感情，因爲死神把我們中間的一個帶到那不可知的地方去了，從那兒，『還沒有有一個旅人回

來過。』有時我不由得對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不由得想像着：假若柏林斯基能夠看見目前所實施的那些偉大的改革——農奴解放，公審制的確立等等，他會說些什麼？會覺得如何？這類有益的事業會在他心裏激起怎樣的狂喜啊！可是他沒有活到這個時候……：他也沒有來得及看到他去世之後我們文學界的許多優異的成就，否則他一定要高興極了。他會多麼滿意L·N·托爾斯泰的詩才，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力量，畢塞姆斯基^①的幽默，薩爾蒂科夫的諷刺，以及萊謝特尼科夫^②的嚴肅的真理啊！這些種子當中有很多都是他親手播下的，除了他，還有誰配日擊它們的萌芽呢……：顯然，誰也不配……

在我這篇柏林斯基回憶錄的結尾處，我要轉載一位跟他很接近的太太的信（我請求她把他逝世的詳情告訴我，因為當時我正在國外，在巴黎），以及他給我的書簡中的若

① 畢塞姆斯基 (A. F. Pisemsky, 1821——1881) 小說家兼劇作家，現實主義巨匠之一。

——譯者。

② 萊謝特尼科夫 (F. M. Reshetnikov, 1841——1871) 民主主義作家，現代人的撰稿

者之一，俄羅斯作家中首先塑造工人形象的人。——譯者。

千片段。

這就是那位太太的信（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發出）

『您想知道一些有關柏林斯基的消息……可是我不會井井有條地敘述，加之，關於一個最後整個時期全身都被肉體的痛苦削弱了的人，幾乎也沒有什麼好說的。我無法給您描出，看到這位可憐的受難者逐漸地走向毀滅，我是多麼難過，多麼悲愴。他從巴黎回來的時候，精神和身體都很好，以致我們大家，連醫生在內，全滿以為他大有康復的希望了。有好幾個早晨和晚上他在我們這兒滔滔不絕地、生動地、激烈地談論着，大家都高興得很，覺得他又是從前那個相聲苗壯的柏林斯基了；然而奇怪，從外國回來以後，他的性情竟大大地改變了：他變得比從前和善、溫良、聽能容忍；甚至在家庭生活中他也先後判若兩人，他顯然是放棄鬥爭，而跟往昔使他強烈地激動過的一切和平共處了。他的健康狀態持續得並不長久；在彼得堡他很快就傷了風，病勢一天天無望，我們每次跟他見面時都發現他可怕地改變了，而且，他已經瘦得不能再瘦了；但再去看他時，却發覺他更加可怕了。我最後一次上他家去是在他故世前一個禮拜；我們碰見他斜靠在安樂椅上；他的臉孔完全像死人的一樣，不過眼睛倒睜的挺大，炯炯有光；他每次呼吸都伴着呻吟；他用這樣的話來迎接我

們：「我死哪，完全死哪。」但他說出這兩句話時並沒有信心，並沒有確信，倒無甯說他是盼望人家去反駁他。我無需對您講當時我們在他那兒度過了多麼苦痛的兩個鐘頭，他自然不能講話了，就是別人向他提起他以前極其關心的那些題目，他也不感興趣，無動于中了。大約是逝世前三天罷，他躺到床上去了，當他的意識還清醒的時候，他似乎一直是懷着希望的；逝世前夕他開始發夢，但還認得當天由莫斯科起來的格拉諾夫斯基。彌留之際他連續地說了兩個鐘頭的話，彷彿是對俄羅斯人民說的，他時常轉向他的妻子，請求她好好地記住這些話，並且準確地轉告那該轉告的人；然而從這篇洋洋洒洒的演講裏幾乎什麼也研究不出來；之後他霍地沈默下來，經過半小時的劇烈痛苦，便溘然長逝了。他那位可憐的妻子……沒有一分鐘離開過他，完全是獨力服侍他，幫忙他打翻身，扶他起床。這位女性……確實值得大家尊敬；整個冬天她都那麼熱情，那麼耐心，那麼百依百順地照顧臥病的丈夫……」

以下是柏林斯基給我的書簡斷片：

● 重點是原信上所有的——原註。

聖彼得堡，一八四七年二月十九日及三月三日。

「……當您準備動身的時候，我就預料到我會失去些什麼了，但您走了之後，我這纔看出我所失去的比當初料想的更多……您一走，我就被煩悶吞沒了，陷入一種麻痺的，忘我的境地了，我感覺無聊，我生平從來沒有這樣無聊過。我十一點，有時甚至十點鐘便上床，午夜以前準睡着，七八點或者將近九點纔起身，整天——尤其是整晚（從下午起）——都昏昏沉沉，這便是我的生活！」

「……×××××●接到K—r●一封罵人的信，但並未拿給×××××●看。後者本來什麼也不知道，但居然猜着了，不過他仍舊我行我素。在向我解釋時，他態度很壞：一壁乾咳着，一壁吞吞吐吐地說，對於我所希求的，他，似乎是爲我好，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意，理由麼，有的他馬上就向我解釋，有的却不便對我講明。我回答說我不知道什麼理由——於是說出了我的條件。他很快活，現在一見面便把兩隻手伸給我，看來他是非常滿意我了。您

● ××××× 指巴納耶夫。——譯者。

● K—r 指凱特契爾 (N. Ketcher, 1809—1886) 醫生兼沙士比頭學者。——譯者。

● ××××× 指涅克拉索夫，下同。——譯者。

可以從我這封信的語氣清楚地看出：我既未惱怒，也未誇張。我曾經愛過他，就是現在，我也常常時而憐惜他，時而埋怨他——爲他，而不是爲自己。心裏跟一個人決裂，在我是很難受的，但事過境遷之後也就沒有什麼了。我不會因爲本身受了損害而憎恨人，造物主很少賜予我這種才能；我富可因爲信仰不同或者全然於我本身無損的缺點與罪惡而憎恨人。現在我還是很推崇×××××的，雖則我認爲他這個人將來會有錢，會致富——而我也知道他的錢是怎麼撈來的。可不是，他已經拿我開刀啦。不過，這件事也說得夠了。

「……告訴您一個消息：我也許會去西利西亞呢。」B●給我送來兩千五百紙盧布。我乾脆拒絕了——因爲如果只有這麼一點錢，我只好把家庭拋棄不管了——而我又不願請求在我離職期間照常支薪。但跟×××××說明過後，我想我是太迂腐了……他非常高興，他準備做一切，只要我……我給B寫了一封信，現在，他的回信會決定這件事的。

「您的卡拉泰也夫很好，雖然較諸霍爾與卡里涅奇大有遜色……」

「……我以爲您沒有，或者只有一點點純粹的創作才能，您的才能跟達利●的相同。他是您真正的本家。但就說葉瑪拉意與磨坊主●罷——也並非什麼天曉得的猥瑣的

● B指波特金。參看九十一頁脚註。——譯者。

東西，而是一篇好作品，因為它寫得精巧，熟練，有思想。我確信您的好鬧者④也很有獨創之處。發現自己的道路，認定自己的崗位——人的一切盡在於此，這就是說，他理解了自己。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那末，您的職責——便是觀察實際現象，並通過想像（但決非單只依靠想像）把它們描畫出來……看在上帝面上，請不要發表那些馬馬虎虎，不壞可也不太好的東西罷。這會大大地損害您的聲譽的完整性（原諒我用了這樣一個「漂亮的」詞兒——我一時想不出更好的來）呢。但霍爾保證您將來會成爲一位出色的作家的。

「……果戈理受到輿論界的猛烈抨擊，所有的雜誌都唾罵他，連他的朋友們、莫斯科的斯拉夫派也厭棄了他——至少厭棄了他那部醜惡的著作……」

『我的妻和我全家人，連您的教子⑤在內，都向您致意……』

④ 達利 (V. I. Daly, 1801—1872) 作家兼語言學者，編著有俄語大辭典及俄羅斯諺語辭典等書。——譯者。

⑤ 卡拉泰也夫，霍爾與卡里涅奇和萊瑪拉意與磨坊主婦三篇均作於一八四七年，後收入鹽人日記中。——譯者。

⑥ 好鬧者是屠格涅夫一八四七年所寫的中篇小說。——譯者。

聖彼得堡，一八四七年三月一（十三）日

「……告訴您，我對×××××某些行為根源的看法差不多已經改變了。現在我覺得他的行動是正當的，是合乎客觀真理的，但他還不瞭解其他更高深的事物——而他之所以未能瞭解，則是因為他成長在醜惡的現實中，又從來不是我們似的理想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之故。我從他的實例看出了：這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對於某些自食其力的人會多麼有益。它們——這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是討厭的，但良藥苦口利於病，甚至，假如爲了從絕症中拯救一個人而在他的有機體裏面接種另一種病症（只要並非絕症）——也沒有什麼關係；這兒主要的不是它討厭，而是它能幫助人……」

「我已經決定到西利亞去旅行了。爲這件事，我真感激波特金，^①他給我找到錢，並且催促我。我不，我從來不會，將來也永遠不會爲自己這麼勞碌，如像他爲我勞碌的一樣。爲了

① 指與友人書簡選萃。——譯者。

② 我是他的兒子的教父。——原註。

③ 波特金（V. P. Botkin, 1811—1869），批評家，翻譯家，西歐主義者，初與柏林斯基，格

拉諾夫斯基及赫爾岑等接近，六十年代時却極力反對涅克拉索夫與車爾尼雪夫斯基，擁

護『純藝術』理論。——譯者。

這樁事，他給我，給 A——v，給 H——n 和自己的兄弟寫過多少信，時而跟甲，時而跟乙，晤談和解釋過多少次呀！前不久他接到 A——v 的回信，立刻把它寄來給我。A——v 送了我四百佛郎。您知道，這人雖然不愁溫飽，但決非闊佬，您自己知道的，在外國，無論什麼時候，四百佛郎至少不算一筆多餘的款子罷。但這還無所謂。A——v 這麼做並未出我意料，教我感動，使我心裏難過的是，爲了我，他竟然改變了自己的旅行計劃，他不去希臘與君士坦丁堡，而要去西利亞了！我對您說，我甚至因此弄得手足無措了，倘若我不知道，不深深地感覺到我是如何熱烈地由衷地愛 A——v，我也許要爲這件事而生氣，而苦惱了。我想乘第一艘輪船出發……」

聖彼得堡，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二（廿四）日

『我要給您寫幾行，我親愛的 T。接到您給我的第二封信，即是您對我兒子的健康表

① A——v 指安寧科夫（P. V. Annenkov, 1812—1887），五十年代的文學批評家——

譯者。

② H——n 指赫爾岑——譯者。

示滿意的那封信之後不久，他就夭折了。這可怕地毀了我。我簡直痛不欲生了。不過還是談談要緊的事罷。我已經拿到西傑金號輪船的船票；它定于五月四（十六）日啓碇……」

五月九（廿一）日我上西傑金號去迎接柏林斯基，在那兒跟他見了面。有人從彼得堡給我來信說，他那位纔滿三個月的兒子的夭折給了他一個無法形容的打擊。不到一年，他也相繼歸天了。

從那時算起，業已過去二十多年了，我這纔來召喚他的高貴的亡魂……我不知道我到底把他的形象的主要特徵傳達了多少給讀者；但我已心滿意足，因為他跟我在一起，過，在我的記憶中……

「他真是個人物！」

一八六八年

● 其實是一年多，柏林斯基逝世于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他的兒子則是四七年三月死的。
——譯者。

附錄一

我這篇論柏林斯基的文章，如所週知，是交由歐洲導報（一八六九年四月號六九五頁）發表的；後來我接到A·D·加拉霍夫^①一封有關這篇東西的信札，我想把信上的一段話揭載在下面。在文學史和批評事業上，這位可敬的作家的見解都受到相當的尊重，而且頗具威信；有好些地方他正是補充了我的意見：

「……說到文學批評或事實方面的什麼錯誤——我倒沒有看出。我只能指明一個我認為不正確的地方。您說，柏林斯基鑑定藝術乃是人類精神活動中一個特殊的、十分自然而合乎法則的領域，他決非為藝術而藝術理論的崇拜者，您還引用了他對普希金的詩篇庶民的批評作為證據。我覺得，至少就年代而言，這件事並不完全如此。那批評是您跟柏林斯基相識的時候的事。這以前（一八四三年以前）他已經給公論、望遠鏡、觀察家和祖國紀事寫東西了。從刊載在這些雜誌（尤其是觀察家）上的他的若干批評文章看來，他顯然承認過「藝術之目的即藝術本身」這著名公式是正確的。為什麼他如此猛烈地抨擊門策爾（見祖國紀事），豈不是由於門策爾在自己的德國文學史上使文學服從文學

① 加拉霍夫（Galakhov, 1807—1892）俄羅斯文學史家——譯者。

領域以外的目標，要求它爲政治的、社會的及其他的目標服務，並且從這一觀點出發，攻擊歌德而讚美席勒麼？記得我有一次去拜望柏林斯基時，他懷着由衷的感激把黑格爾與歌德的畫像指給我看，認爲他們兩人是純思想和純藝術的最高代表。』

接着，A·D·加拉霍夫爲要證實自己的話，還從不久以前出版的A·斯坦格維奇的著作T·N·格拉諾夫斯基中（一一四——一一六頁）引徵了一段。

顯而易見，我應該預先說明一聲。當我認識柏林斯基時，他的見解恰如我所記述的，那以前不久他纔改變過。他內心的政治激流衝湧得更猛烈了。

附錄二：

我說柏林斯基缺乏政治資質，但A·N·貝甯●在那部著名的柏林斯基傳裏反駁我這見解，認爲他的『審慎』乃是對於當時的特殊環境的一種無可奈何的讓步。我準備同意可敬的學者貝甯先生對我們偉大批評家的性格的這一方面，的評論多半要比我的

● 貝甯（A. N. Pining, 1833—1904）文學史家，彼得堡大學教授，現代人與歐洲導報的撰稿人之一。——譯者。

評論正確些——我以為向讀者們說明這點是我的職責。我所提及的那種「火燄」從來沒有在柏林斯基的內心熄滅過，雖然它不能經常迸發到外面來。

巴黎，一八七九年九月補記

III 果戈理

(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萊蒙托夫，查果斯金)

已故的米哈依爾·謝明諾維奇·史遷普金領我去看果戈理。我還記得我們訪問的那天是一八五一年十月二十日。其時果戈理住在莫斯科尼基塔路托爾斯泰伯爵處（他們住的房子是塔雷遜的產業）。●我們于午後一時到達；他馬上接待了我們。他的房間在右首靠近大門的地方。我們走進去——于是我看見了果戈理，他站在寫字台前，手裏拿着一枝鋼筆，身穿黑大衣，綠天鵝絨背心，肉桂色褲子。一個禮拜以前，我曾在公演欽差大臣

●托爾斯泰伯爵指果戈理的朋友A·P·托爾斯泰。塔雷遜 (Talzin) 是當時莫斯科

位富翁——譯者。

的戲院中見過他；他坐在二樓緊靠門口的包廂裏，伸起頸頸，帶着神經質的焦躁，不時從兩位健碩的太太（她們來給他做保鏢，免得他被好奇的公衆包圍）的肩膀上向舞台張望。經過跟我同座的F的指點，我立刻回轉來瞧他；他大概覺察到了我這個動作，所以稍稍往後邊的角度裏移動了一下。一八四一年以來他的容貌的改變使我大爲驚異。那時候我在阿芙多契雅·彼得羅芙娜·E——娜雅（Avdotya Petrovna E-naya）家碰見過他兩三次。當時他還像個矮胖結實的小俄羅斯人，此刻却又憔悴又衰弱，簡直是朝不保夕了。他那素來靈活的臉部表情中，蘊雜着一種隱秘的苦痛與煩惱，一種令人憐憫的焦躁。

一看見我和史遷普金，他就露出喜悅的神情迎了上來，跟我握手，說：『我們早該做朋友了。』我們坐下。我和他並坐在一張寬大的沙發上，米哈依爾·謝明諾維奇坐的則是他旁邊的安樂椅。我更仔細地觀察他的外貌。他那從鬢腳上直垂下來的（通常哥薩克都是這樣的）金髮還保留着青春時代的色彩，但顯然已經很稀疎了；而扁平的、光滑白皙的前額仍舊流露着智慧。一對不大的褐色眼眸時時閃耀着愉快——正是愉快，而非譏諷；不過他的眼光似乎總是很疲憊的樣兒。那管長長的尖鼻子給果戈理的相貌增添了一種狐

狸般的狡黠；修剪過的鬚鬢底下兩片略嫌肥厚的、柔軟的嘴唇予人的印象也不佳；它們的模糊的輪廓表現着——至少我覺得如此——他的性格的醜惡面；當他說話的時候，它們便可厭地張開來，露出一排難看的牙齒；尖削的下顎埋在寬大的黑天鵝絨頸巾裏。果戈理的儀態和舉動不像一位教授，倒是像教員——他令人想起外省專門學校和中學裏的老師。『你是一個多麼聰穎、古怪、病態的人呀！』我望着他，不由得要這樣想道。記得我跟米哈依爾·謝明諾維奇是他當作一位才智非凡，然而頭腦腐敗的人物來拜訪的……整個莫斯科對他都這樣看法。

米哈依爾·謝明諾維奇預先就警告過我，說不要跟他談起死魂靈的續篇，即是他那麼長久地、耐心地爲它勞作過，而如所週知，臨終時却付之一炬的小說第二部，說他不喜歡這個話題。我決不會自動提到與友人書簡，因爲我對它毫無好感。況且我根本不打算談什麼話，我只渴望見一位我幾乎把他的作品熟讀成誦了的人罷了。當時他的名字的感召力之大，是很難向今天的青年們說明的；目前衆望所歸的人物連一個也沒有了。

史遷普金事先跟我說果戈理並不健談，其實不然。果戈理談了許多話，並且談得有聲

有色，他用了抑揚頓挫的音調清晰地吐出每個字來——這非但不顯得矯揉造作，反而給他的談話添上一種悅耳動人的力量。他愛強調『O』字的發音，至于俄羅斯人聽來不太舒服的小俄羅斯方言的其他特徵，我倒沒有覺察到。一切都說得和諧，流利，有趣，準確。他最初給予我的疲乏、病態、神經質的焦躁等印象全都消失了。他縱論文學的意義，作家的天職，以及對自己的作品應該採取的態度，關於創作過程本身，寫作生理學（假如可以這麼講的話）本身，他也發表了一些精闢中肯的意見。所有這一切盡是用生動而獨創的語言說出來的，再則，就我觀察所及，這些話決不是預先準備好的，如像『名流』常有的情形那樣。唯獨當他把談鋒轉向審查制度，差不多是揶揄與歌頌這制度，說它在培養作家保護自己的作品的手腕和技巧上，在培養作家的耐心與許多其他教徒的及世俗的美德上，都大有裨益——唯獨那時候，我纔覺得他搬出一套現成的法寶來了。同時我想，用這種方法來證明審查制度的必要，豈不等于肯定乃至讚美奴隸的狡黠與詭譎麼？我倒是贊成一位意大利詩人的詩句：『不錯……我們是奴隸，而不是永遠憤怒的奴隸。』但奴隸竟會滿足于自己的溫順和欺詐……！最好不談這個罷。在果戈理諸如此類的高論與妙語當中極明顯地表現着達官貴人們對他的影響，書簡的大部分便是呈獻給這般人的：那種腐朽的、沮喪

的氣息之根源就在這兒。總之，我立即感覺到果戈理的和我的世界觀之間橫着一道鴻溝。我們所恨的不是一個東西，所愛的也不是一個東西，但在那個時刻，我認為這一切並不重要。我面前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偉大的藝術家，我虔敬地盯着他，聽着他，甚至當我不同意他的時候。

果戈理大概知道我跟柏林斯基及伊斯康大之間的關係；關於柏林斯基和他給他的那封信——他一字不提；這個名字會燒焦他的嘴唇。但那時候伊斯康大剛剛在一份外國出版物上發表一篇論文，因為臭名昭著的書簡的原故而責難果戈理，說他背叛了原先的信仰。果戈理自動地提及這篇論文。從他逝世後所發表的遺札（啊！如果發行人能把這些遺札刪掉整整三分之二，或者至少刪掉寫給上流社會的太太們的全部信件，那對果戈理真是一大恩惠……它們是各種矛盾的總匯：狷傲與探求，神聖與虛榮，一方面是預言家的語氣，另一方面却是食客口吻——文學中再也沒有比這更矛盾的東西了！）——從果

● 即赫爾岑，見回憶柏林斯基篇譯註。——譯者。

● 指柏林斯基的致果戈理書——譯者。

戈理的遺札中我們知道他的書簡的全盤失敗（這失敗不能不說是當時輿論界一點差強人意的功績）如何像一個無可救藥的創傷似的隱藏在他心裏。在我們訪問那天，我和已故的M·S·史遷普金便親眼看見過這創傷是多麼使他痛楚。果戈理用了猝然變得急躁的聲調跟我們說，他不懂何以有人會在他從前的著作裏看出什麼反抗精神，看出什麼他日後背叛了它的東西來；他說他永遠遵奉着同一套宗教教義和保守主義——他還準備找來一部早已出版的作品，指出其中的幾段給我們看，作為證據……講完這幾句話過後，果戈理便幾乎像一個青年般的矯捷地從沙發上一躍而起，跑到隔壁房間去了。米哈依爾·謝明諾維奇眉毛一揚，伸出食指，悄悄地對我說：『我從沒見過他是這樣的。』……

果戈理手裏拿着一本小品集轉來，接着他就從一篇幼稚、浮誇、煩瑣而空泛的文章（這部集子裏盡是這類東西）中隨便挑出幾段來朗讀。我還記得那大意是說嚴格的法令和絕對服從政府的必要，等等。『哪，你們看，』果戈理反復地說，『我以前的思想主張跟現在一模一樣……爲什麼要罵我變節，背信……爲什麼罵我？』——這便是經常上演的。

最富否定精神的喜劇欽差大臣的作者講的話！我和史遷普金都啞口無言了。果戈理終於把書本丟在桌子上，重新漫談藝術與演劇了；他說他仍然不滿意欽差大臣的演員們的演技，因為他們『失掉了那種調調兒』。他打算把整個劇本從頭至尾給他們唸一遍。史遷普金抓住這句話，立刻追問朗誦的地點和時間。湊巧有一位老太太來找果戈理，還給他帶來一些聖餅和切成小塊的聖麵包。我們只好告辭了。

約莫過了兩天，欽差大臣朗誦會在果戈理住的那幢房子的一間大廳裏舉行了。我請求他准許我參加這次朗誦會。已故的謝維略夫教授^①也是聽衆之一，博果金^②似乎也在座，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使我大爲驚奇的是，欽差大臣的演員當中出席果戈理招待會的並不多，他們覺得去『受訓』有傷體面。女演員更是一個也沒到。我發現果戈理很懊惱，因

① 謝維略夫 (S. P. Shevirev, 1806—1864) 保守的文學史家，批評家兼詩人，莫斯科大學的俄羅斯文學教授，斯拉夫派首領之一。——譯者。

② 博果金 (M. P. Pogodin, 1800—1876) 史學家兼政論家，請參閱回憶柏林斯基篇譯註。——譯者。

爲他的提議只得到如此冷淡和微弱的反應……大家都知道他多麼珍惜這種同情。他的表情陰鬱而嚴峻，眼睛懷疑地向前凝視着。那天他看來真像個病人。開始朗讀之後，他纔顯得稍微活潑些。他的兩頰泛起一抹淡淡的紅暈，眼睛睜大着，迸射着光輝。果戈理唸得很出色……那是我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聽他朗誦。狄更司可以說也是一位出色的朗誦家，他常常唸自己的小說，他的朗誦極動人，幾乎是做戲似的；他一個人抵得上好幾名一流演員，他能教你時而笑，時而哭；反之，果戈理使我感動的却是他那非凡的質樸，很有節制的態度，以及嚴肅而又天真的誠摯——有沒有聽衆，他們想些什麼，他好像毫不在意。果戈理似乎僅僅關心如何闡明那他自己認爲很新穎的主題，如何更忠實地傳達出自己的感受。效果異常的好——尤其當他唸到滑稽幽默之處的時候，你簡直不能不發出響亮的、健康的笑聲來；但這一份樂趣的賜予者却仍然繼續唸下去，並未被普遍的歡悅所擾亂，他心裏彷彿對這種歡悅感覺詫異，倒反愈益沉浸到工作本身中去了——只是偶爾地，在這位巨匠的嘴唇和眼角上會浮出一個不易覺察的狡狴的微笑來。當果戈理唸出那位市長關於兩隻老鼠的名句（在劇本開頭的地方）『它們跑來，嗅了一嗅，又跑開了！』之際，他是多麼猶豫，多麼驚訝啊！——他甚至慢慢地環顧我們一下，有如要求我們解釋這個奇怪的故事一般。

此刻我纔瞭解，通常上演欽差大臣時，演員們爲什麼總是那麼錯誤地、膚淺地專想逗人發笑了。我坐着，沉湎在喜悅的感動裏：這對於我是真正的盛宴和佳節。可惜他繼續得並不長久。果戈理還沒有來得及唸完第一幕的一半，房門突然呀的一聲開了，一位年紀很輕，但却異常執拗的作家向他微笑着，慌慌張張地點了點頭，便穿過整個房間，不跟任何人招呼一聲，連忙在角落裏佔據一席座位。果戈理把話頓住，猛力地用手打着叫人鈴，然後氣沖沖地對應聲而至的僕人叱責道：『我不是吩咐過你不讓任何人進來的麼？』那位青年作家在椅子上微微移動了一下，可是毫無窘色。果戈理喝了點兒水，又開始唸下去，但已經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他唸得很快，像喃喃自語似的，許多音節都被跳過了；有時他更整句整句的漏掉，只是揮揮手完事。作家的驟然出現擾亂了他：他的神經顯然受不住一點刺激。唯有唸到赫萊斯塔科夫●撒謊的那一場的時候，果戈理纔重新振作起來，提高了嗓音：他已向飾伊凡·亞力山大洛維奇一角的人表明應該如何演出這真正困難的一段來。我以爲，經過果戈理朗誦之後，這一段便顯得自然和近于真實了。赫萊斯塔科夫是被自己的奇異的地位、四周的環境與他本身的輕佻的機警所迷惑了；他也知道他在撒謊，然而他相信自己的謊

言：這似乎是一種狂熱、啓示和創造者的自我陶醉，而並非單純的謊言或單純的誇誇。連他本人也給它『抓住』了。『請願者們在接待室裏發出嗡嗡的聲音，三萬五千名信差四處馳騁，——而那些傻瓜却尖起耳朵諦聽着，嘿，我是一個多麼勇敢、活潑、老練的青年啊！』從果戈理嘴裏唸出的赫萊斯塔科夫的獨白給人的印象，就是這樣。但一般地講，那天欽差大臣的朗誦，用果戈理本人的話來說，不過是一個提示，一幅素描罷了；這都是爲了那位莽撞的作家的原故；他後來甚至更加無禮，當大家都走掉以後，他還賴在蒼白的、困頓的果戈理身邊，並且尾隨着闖進了他的書房。

我在大門口跟果戈理告別，此後便再也沒有見過他了；但彷彿命中註定了似的，他對我的生活還有過一次重大的影響。

次年，即一八五二年二月末梢，當我在貴族會堂大廳參加『貧民調查協會』（它不久就解散了）的一次朝會時，突然碰見I·I·巴納耶夫^①，他匆匆忙忙地從一個人跑到另一個人那兒，顯然是在向他們報導一個意外的噩耗，因爲每人臉上都立刻露出了驚

① 巴納耶夫，作家及現代人編年之一。詳見回憶柏林斯基篇譯註。——譯者。

與悲愴的神情。巴納耶夫也終於跑到我身邊來了，他帶着淡淡的笑容，用鎮靜的聲調說：『你知道麼，果戈理在莫斯科死了。一定，一定是……把全部手稿燒掉——這纔死去的。』——然後就跑開了。毫無疑義，對於這樣一位人物的凋喪，作為作家的巴納耶夫的內心是很哀痛的，（何況他還有着一顆良善的心）但他也爲了自己是傳出這驚人新聞的頭一個人而感到滿足（那鎮靜的聲調不過是用來表示他更大的驕傲罷了）——這滿足和喜悅淹沒了他心裏的任何其他感情。在彼得堡，關於果戈理病況的無稽謠言已經傳播好幾天了；不過誰也沒有料到他會就此溘然長逝。在這個消息給我的最初的印象之下我寫了這麼一篇短文：

彼得堡來信

果戈理死了！——俄羅斯人的心靈哪有不被這句話所震撼的？——他死了。我們的損

● 見莫斯科新聞（譯者附註：莫斯科新聞是俄羅斯最早和歷史最悠久的報紙之一，一七五六年由莫斯科大學創辦，直至一九一七年纔停刊。）一八五二年三月十三日，三十二期，三

二八——三二九頁——原註。

失是如此慘重，如此出乎意外，以至我們始終不願相信它。正當我們大家企盼他能打破自己的長期沉默，滿足乃至超過我們的殷切的嚮望之際，却傳來了這個噩耗！是的，他死了，我們現在有權利，有死亡所給予我們的不幸的權利稱這人為偉大人物，這人的名字標誌着我們文學史上的一個時代，這人是我們的誇耀，是我們的一種光榮！他死了，他也跟他的前輩中最崇高的人們那樣，正在壯年，正在自己精力最旺盛的當兒，還沒有完成他的初期事業，就倒下了……這個損失勾起了我們對於那些難忘的損失的哀悼，恰似新的創傷引起了舊的傷口的劇痛。論述他的功績是將來的事，此刻還不是談它的時候，這兒也不是談它的地方；然而我們深盼將來的批評家能瞭解本身的任務，能用公允的，但却充滿着尊敬與熱愛的態度去評論他，如像後代評判跟他類似的人物一般；我們目前還談不到那些！我們只是想對那種瀰漫在我們四周各處的偉大哀慟表示一點共鳴罷了；我們不想評論他，而是想哭；我們此刻無法平心靜氣地談果戈理……給淚水浸濕了的眼睛看不清這個最親愛、最熟悉形象……當莫斯科安葬他的那一天，我們真想從這兒伸手給它，跟它一同溶化在普遍的悲愴裏。我們未能最後一次瞻仰他的遺容，可是我們要向他遙致惜別的至意，並且懷着虔敬的感情，把我們的哀愁和我們的熱愛當作一份禮物，寄往他的新

鮮的墓穴，因為我們沒有機會像莫斯科人似的能將一撮親切的泥土投在它裏面——一想到莫斯科將是他的安息之地，我們心頭便洋溢着一種黯淡的滿足。是的，讓他在那兒，在俄羅斯的心臟中安息罷，他是如此透澈地理解俄羅斯，又如此愛它，如此熱烈地愛它，他所說的每句話都包含着這種愛欲，唯有淺薄或近視的人纔感覺不出這一點！但一念及他的天才的最後和最成熟的果實也許無可挽回地毀滅了的時候，我們的痛苦是無法形容的，——聽到它們被焚的可怕的流言，我們戰慄了……

有少數人會覺得我們的話是誇大的，或者甚至是信口胡說的，我們不必提起他們：死亡具有澄清和調停的力量；中傷和忌妒，怨恨與誤解，——一切都會在最平凡的墳墓面前沉靜下來！人們不會吵到果戈理的墳墓上去的。無論歷史給他安排的最後地位如何，可是現在我們相信，誰也不會拒絕隨聲附和我們：願他在天之靈安息，他的一生是值得人們永遠紀念的，他的名字是永遠光榮的！

我把這篇文章送到彼得堡一家雜誌社去，但當時圖書審查的嚴格程度已經大大地加強了（那是前不久纔開始的）……這種“Crescendo”（意大利語：漸次增強）時時刻刻地，而且——在旁觀者看來——像瘟疫流行時死亡率的增加那樣毫無道理地進行着。我的文章送出去之後老不見登出來。我在街上碰到發行人，就問他這是什麼意思。『您瞧現在是什麼天氣，』他打了個比方回答我，『連想都不用想。』我解釋說我那篇文章並沒有什麼漏洞。『問題不在有漏洞沒有漏洞，』發行人反駁道，『總之是不准提起果戈理』

● 提到這篇文章（當時有人說了句公道話：報章雜誌對任何富商鉅賈的逝世的反響都會更熱烈些）我就想起一個故事來：彼得堡一位極高貴的太太覺得我爲這篇文章而受的懲罰是太重了，無論如何是過於嚴厲和殘酷了……總之她熱情地庇護我。於是有人告訴她：『您不知道，他在那篇文章裏稱果戈理做偉大人物呢！』——『他不會的！』——『我最給您寫包票。』——唉！在這種場合，我還有什麼話好說：je regrette, mais je comprends qu'on ait du servir.（法語：我很抱歉，可是我明白他們原本應當嚴懲的。）

——原註。

的名字。查克萊夫斯基^①可以披了安德萊夫大綬去參加葬儀，此地可不行呢。」不久以後，我接到一位朋友從莫斯科寄來的信，信上盡是些譴責的話：「怎麼！他叫道，『果戈理死了，你們彼得堡的雜誌居然毫無反應！這種緘默多可恥！』我在回信中向我的朋友說明了——我承認我的措辭十分激烈——這緘默的原因，還附上我那篇違禁文章作為書面證明。他立刻把它呈給當時莫斯科總督納茲莫夫（Nazimov）將軍去審查，並於獲得他的允許後交由莫斯科新聞發表。這是三月半的事；到了四月十六日，我就揹着違反和破壞審查條例的罪名，給抓進警察署去監禁了一個月（最初二十四小時是在監牢裏度過的，我還跟一位溫文爾雅、頗有教養的警察下士攀談過，他告訴我他如何在夏園裏散步，如何聞到『鳥兒的馨香，』）之後又被發配到鄉下去居住。我絕對無意攻擊那時的政府：聖彼得堡總督，於今已經故世了的穆遜——普希金（Musin-Pushkin）認為——我不知道他是何居心——全部問題是在於我這方面的公然違法；他毫不躊躇地向他的上司保證，說他曾經親自召見我，並且親自將審查委員會禁刊我的文章的命令交給了我（依照現

① 查克萊夫斯基（A. A. Zakrevsky, 1786—1865）伯爵，將軍，曾任總督及內政部長等要職。——譯者。

行法令，一個審查官的禁令並不能阻止我把我的文章交給另一個審查官去裁判。而我却根本沒有見過穆遜——普希金先生其人，自然也沒有對他解釋過什麼了。政府是不會懷疑一位高級官員，一位它所委任的人竟會如此歪曲事實的！但這樣更好，拘禁和後來的鄉居確實於我大有裨益：它們使我接觸了俄羅斯生活的某些方面，倘在平常的情況下，我也許不會注意到這些方面的罷。

寫完上面一行過後，我纔記起我跟果戈理的初次會見還遠在本文開頭處所說的那個時間以前。當他一八三五年在聖彼得堡大學教授（！）歷史時，我就是他的聽講者之一了。老實說，他的授課是很奇特的。第一，他三堂課準有兩堂缺席；第二，即使來上課他也不講書，而是低聲低氣地說些拉拉雜雜的話，或者把巴勒斯坦及其他東方國家的風景畫片（一些小型的銅版畫）拿給我們看看，——並且整個上課時間他都非常慌張。我們全相信（我們並沒有看錯）他對於歷史一無所知，都認為我們的教授的果戈理——雅諾夫斯基（Gogol—Yanovsky）先生——課程表上這麼稱呼他——跟作家的果戈理之間毫無共同之點，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他便是狄康加附近農村之夜的作者了。在他所擔任的

功課舉行畢業考試的時候，他纏一塊頭巾，愁眉苦臉（彷彿是牙齒痛，）一聲不響地枯坐着。結果只好由 I. P. 蘇爾庚（Stul'sin）教授代他考問學生。他那副憔悴的，有着一管長鼻子的臉孔和那塊黑色絲質頭巾的兩個高聳着的，耳朵似的尖端，還歷歷如在目前。毫無疑義，他很有自知之明，他瞭解本身處境的可笑與惡劣，所以就在那一年辭職不幹了。但這並未妨礙他喊出：『我不承認上過講壇，也不承認如今下了講壇！』他生來是做同代人士的導師的，不過不從講壇上宣教而已。

我曾在前面第一篇文章裏提及我跟普希金的會見，關於其他幾位已故的文學巨匠，只要是我見過的，我也想帶便說幾句。我從茹科夫斯基講起罷。一八一二年[●]之後不久，當他卜居貝列夫郡自己的村莊中的時候，他到我母親——那時她還是一位少女——的姆采領地去訪問過她好幾次，甚至還有一種傳說，說他曾經在一回家庭演劇中扮魔術師的

● 狄康加附近農村之夜（一八三一——三二年）是奠定果戈理的文壇地位的兩卷小說
果——譯者

● 拿破倫侵略俄之年——譯者

角色，我彷彿也在我父母家的貯藏室內看見過他那頂飾有金色星章的便帽。但那已經是多年前的事了，他或許早就忘記了這位萍水相逢的鄉下姑娘，亦未可知。我們全家遷居彼得堡的那一年——其時我是十六歲——我母親忽然想起了瓦西里·安德萊耶維奇，便在他的命名日之前繡了一隻華麗的天鵝絨枕頭，派我送到冬宮去給他。我必須向他自我介紹，說明我是誰的兒子，然後纔獻上禮物。可是，當我跨進那雄巍的、已往從沒見過的皇宮之際，當我走過那石頭長廊，登上石頭台階，不斷地碰到也像石頭般的一動不動的衛兵之際，當我終於找着了茹科夫斯基的宅邸，突然出現在一名身長三阿爾申的，所有的縫口上都鑲着飾邊，飾邊上又繡着老鷹的紅衣侍從面前之際——我是那麼詫異，那麼恐懼，以至於，在我應了紅衣侍從的邀請，走進一間書房，發現詩人的沉思、慈祥，但也嚴肅而略微吃驚的臉孔正從一張長寫字台後邊向我凝視的時候，我，雖則力持鎮定，還是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真像俗語所謂的『舌頭粘在喉嚨上』了，我渾身冒冷汗，幾乎要掉眼淚了，我生

● 茹科夫斯基的教名與父名。——譯者。

● 一八二六至四一年間茹科夫斯基是皇太子（即未來的沙皇亞力山大二世）的師傅，住

在宮廷裏。——譯者。

了根似的站在門檻上，只是用雙手抱着——如像抱着一個受洗禮的小孩——那隻不幸的枕頭（此刻我還記得那上面繡着一位身穿中世紀服裝，肩膀上有一頭鸚鵡的姑娘。）我的窘態大概在茹科夫斯基的善良的心裏引起了憐憫之情，他走近我，輕輕地接過我的枕頭，請我坐下，並且謙和地跟我交談起來。我終於向他講明了事情的原委——然後就儘快地溜走了。

當時在我看來，作為詩人的茹科夫斯基已經失掉他往昔的重要性了；但我依然滿足於我們的會見——儘管是一次失敗的會見；回家途中我懷着一種特別的情感想起他的微笑，他的親切的語氣和斯文嫺雅的舉動。茹科夫斯基的畫像幾乎全都維妙維肖，因為他的面貌很容易把握，又不常變化。在我們父輩的想像中，這位「俄羅斯軍營裏的歌手」乃是一個孱弱的後生，到了一八四三年，他身上自然是連這樣的痕跡都不留下了；他變成一位威嚴的人物，差不多變成大胖子了。他那副略嫌臃腫的乳色臉孔沒有一絲縐紋，顯出很安詳的神態；他的腦袋低垂着，彷彿是在諦聽和思索什麼似的；纖細的、稀薄的頭髮像幾支小辮子般的翹在那幾乎完全光禿了的腦頂上，一對烏黑的，富於中國情調的丹鳳眼迸射

出深邃的光芒，閃耀着恬靜的慈祥，兩片異常厚大的，但輪廓還算端正的嘴唇上面則經常浮着不易覺察的，然而真摯的微笑，表示他對我的眷顧與歡迎。他那半東方的血統（如所週知，他的母親原是土耳其人）是由他整個的風貌顯露出來了。

過了幾個禮拜，我們一家的老朋友伏英·伊凡諾維奇·古巴萊夫（Voin Ivanovich Gulbarev）領了我再去看他。這古巴萊夫是一位著名的典型人物，奧爾洛夫省克羅姆那的窮地主，年輕的時候跟茹科夫斯基、布魯多夫[●]和烏瓦羅夫過從極密；在他們那個集團中算是法蘭西哲學、懷疑主義、百科全書派以及理性論的代表，一言以蔽之：他是十八世紀的代表。古巴萊夫講得一口流利的法語，熟悉伏爾泰，並且把他看得比世界上一切都高；他不大讀別的作家的作品；他的氣質純然是法蘭西式的，但我要連忙添上：革命前的法蘭西式的。我至今還記得他那高亢而冷酷的笑聲，（他幾乎經常這樣發笑，）大膽的，稍微有些憤世疾俗的批判與諷刺。單單是他那副外貌就決定了他非過自食其力的獨身生活不可；他這人醜陋無比，肥胖，大頭，滿臉麻子。由于長期居留外省的結果，他畢竟有了些改

● 布魯多夫（D. N. Bludov, 1785—1864）政治家。——譯者。

變，但他始終是個「典型」，始終保持着自由思想甚至文雅風度。愛穿小貴族所常穿的寒酸的哥薩克式寬大上衣，在家時穿一雙擦得雪亮的長靴。我不知道他爲什麼不願像他的同伴們似的往上爬，替自己開創一個錦繡前程。大概因爲他缺乏相當的堅忍力，又沒有什麼野心的原故罷：野心這東西是跟他向自己的老師伏爾泰學來的那種半冷漠、半嘲諷的快樂主義互不相容的；他不承認自己有文學才能，幸運之神也從沒有對他微笑過——于是他消聲匿跡了，蒼老了，變得孤獨了。然而，如果研究一下這位澈頭澈尾的伏爾泰主義者年輕時怎樣跟他的密友、未來的「詩人」和席勒的翻譯者相交遊，倒是挺有趣的！再也不想不出比這更矛盾的事了；但所謂人生本來就不是什麼別的，不過是經常克服矛盾而已。

住在彼得堡的茹科夫斯基想起了老友，而且沒有忘記怎樣纔能使他稱心滿意：送他一部嶄新的、裝幀華麗的伏爾泰全集。據說，古巴萊夫逝世（他享壽很高）前不久，鄰居們走進他那頹敗的小屋裏，看見他坐在一張破舊的桌子旁邊，桌上就擺着他的闊朋友所送的禮物。他小心翼翼地翻着心愛的書本的金邊頁子——在荒僻的草原上像青年時代似的天真地用雋妙語來娛樂自己，恰如從前菲特烈大帝在無愁宮和葉加傑林娜二世在沙皇村所做的一樣。他心目中沒有別的智慧，別的詩，別的哲學。當然，這並未妨礙他在頸額

上掛一大堆聖像與香袋，^①和甘受一個無知的管家婆的擺佈……矛盾的邏輯！

此後我再也沒有碰到茹科夫斯基了。

我見過克雷洛夫 ^②一次，是在一位官階很高，然而無甚才能的彼得堡作家家裏的晚會上。他在兩扇窗子之間的地方連續地癡坐了三個多鐘頭，可是沒有開過口！他穿一身寬大的舊燕尾服，圍着白頸巾，飾有流蘇的長靴緊裹着兩條肥碩的腿子。他的雙手攔在膝蓋上，那個巨大笨重，但也高貴的腦袋連一動也不動，只有凸額頭底下的一對眼睛還間或溜轉一下。不知他是在聽別人講話和思索呢，還是就這麼枯坐和「存在」着？這張寬闊的道地俄羅斯型的臉孔上面既沒有睡意，也沒有聚精會神的表情，有的只是超人的智慧與根深蒂固的慵懶，而且彷彿有個狡黠的東西時時想顯露出來，却又不能——或者是不願——突破這塊衰老的脂肪……最後，主人來請他吃晚飯了。「乳豬燒蔞菜給您做好啦，伊凡·安德萊依奇。」他急急忙忙地說明着，好像履行了一樁無可奈何的義務。克雷洛夫望

① 香袋是一種裝聖物的小袋，舊教徒常用它作為護身符。——譯者。

② 克雷洛夫 (I. A. Krilov, 1769—1841) 知名的寓言作家。——譯者。

着他，神情似感激，又似嘲弄……「真是乳豬麼？」——他心裏似乎這樣說，於是呆笨地站起來，呆笨地拖着兩條腿子，走到餐桌旁邊，佔據了自己的席次。

萊蒙托夫我也只見過兩次：頭一次是在彼得堡一位高貴的太太S公爵夫人家裏，過了幾天（一八四〇年元旦前不久）又在貴族會堂的假面跳舞會上看到他。我難得參加上流社會的晚會，因為我對這很不習慣，在S公爵夫人家的那一回，我躲在角落裏，只是遠遠地觀察着這位一舉成名的詩人。他坐在一張矮凳上面，當時首都美女之一，金髮的M·P伯爵小姐，一位薄命的、真正的絕代佳人，披着一襲黑色長袍，剛巧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萊蒙托夫穿的是近衛驃騎兵聯隊的制服，他並不取下佩劍和手套——彎着腰身，皺起眉頭，陰鬱地望着伯爵小姐。她很少跟他交談，却時常轉向他並坐着的，也是驃騎兵的S伯爵。萊蒙托夫容貌上有一種不祥的、悲劇的徵兆；他那淺黑的臉孔和凝神注視的又黑又大的眼睛，顯露出一種祕奧而兇惡的力量，一種孤傲與煩惱。他的呆滯的目光，跟那幾乎是孩童似的、柔軟優美的嘴唇的表情出奇地不調和。他的矮胖的身段，向外彎曲的兩腿，圓圓的、寬闊的肩膀上的大頭，——總之，整個形體都令人發生不快之感；然而任何人都會立刻看

出他的天才。如所週知，在某種程度上說，畢巧林乃是他的自我寫照。『當他笑的時候，他的眼睛並不笑』●之類的話確實可以移贈給他自己。我記得S伯爵和他的對談者不知爲什麼突然發起笑來，而且笑得很久；萊蒙托夫也笑，但同時却無禮地驚訝地盯着一個人。雖然如此，我仍舊覺得他很愛他的同志S伯爵，對伯爵小姐也滿懷着懇摯的感情。毫無疑義，他受了那時的風氣的影響，多少有些故意摹仿拜倫，此外還雜雜着其他更壞的怪癖狂念。他爲此付出的代價太高了！萊蒙托夫的內心也許深深地感到寂寞，命運替他安排的那個狹小的圈子使他覺得窒息。在貴族會堂的舞會上，別人不讓他安靜，時常纏擾他，跟他握手；假面不斷地更換着，但他却幾乎沒有離開過座位，只是默默地聽着人家的竊竊私語，把自己的憂鬱的眼光從這人移到那人身上。當時我彷彿發現他的臉上有一種詩興勃發時的優美表情，或許他想起這些詩句了：

『當那雙向無畏懼的手

帶着都市美人酒脫的大胆

● 見當代英雄。萊蒙托夫文集（一八七〇年版）第二八〇頁。——原註。

碰到我冰冷的手的時候……」

關於另一位已故的作家，我也要帶便說兩句，雖則他是屬於「*diis minorum gentium*」（拉丁文：弱小民族的神），絕對不能跟前面說到的幾位相提並論的——他就是M·N·查果斯金。他是我父親的密友，三十年代我們住在莫斯科的期間，他差不多天天來我們家裏玩的。在我一生中，頭一部使我深受感動的文學作品便是他的尤利·米羅斯拉夫斯基。這部著名小說出版的時候，我正在維頓加彌（Veydengammer）先生所辦的寄宿學校唸書；我們的俄文教員兼級任導師每當課餘之暇常對我的同學們和我講述它的內容。米羅斯拉夫斯基的僕人吉爾莎、阿列克塞和強盜奧利雅西的冒險故事教我們多入迷啊！然而——怪事！儘管我覺得尤利·米羅斯拉夫斯基是一部登峯造極之作，但我看到它的作者M·N·查果斯金時却完全無動于中。要解釋這樁事並不難：米哈依爾·尼古拉耶維奇給我的印象匪特未能加強他的小說所喚起的崇敬和喜悅的感情，反而削弱了它。查果斯金身上沒有什麼偉大的、重要的，足以刺激年輕人的想像的東西，老實說，他甚至還非常可笑，而他那罕見的敦厚也並未博得我的適當評價；照輕佻的青年看來，這種

品質是毫無意義的。查果斯金的容貌本身，他那奇怪的、彷彿被壓扁了的腦袋，四方的臉孔，經常戴着的眼鏡後面的凸出的眼珠，近視的，呆滯的目光，當他表示驚訝或者甚至只是說話的時候那眉毛、嘴唇和鼻子的不正常的動作，突如其來的叫喊，手的揮擺，以及把他的短短的下巴分成兩半的深刻凹痕，——我感覺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古怪的，惡劣的，滑稽的。此外，他還有三個同樣極其可笑的弱點：他想像自己是一位非凡的大力士；自信能征服任何女人；最後（這在一位如此熱情的愛國者身上尤其是不可思議的）——他還有一種怪癖：喜歡故意曲解法文，時常把它的「數」與「性」混淆起來，因此他竟在我們家裏得

● 關於他的力氣的奇談竟傳到國外去了。在德國的一次公開朗誦會上我不勝驚疑地聽到一篇故事詩，其中描述大力士拉波（Rappo）蓋臨莫斯科維亞（譯者附註：莫斯科維亞即莫斯科國，十五至十七世紀去俄羅斯遊歷的外國旅行家的遊記中常用此稱呼。）的首都，在一家戲院裏表演，他向一切人挑戰，竟把一切都打敗了；但因爲不忍目睹同胞的受辱，觀衆之中霍地站出 *der russische Dichter: stehet auf der Zagoskin*（德語：俄國詩人查果斯金站了出來）（重音在『金』上）——他跟拉波搏鬥，打敗了他，然後客客氣氣地敬饗而去。——原註。

到一個綽號：“Monsieur Partide”（法語：「冠詞先生」）雖然如此，人却不能不愛米哈依爾·尼古拉耶維奇，因為他有着一顆黃金似的心和真純坦率的性格——這性格也貫穿在他的作品裏。

我跟他最後一次會見的情形是很淒慘的。過了許多年，正當他逝世之前不久，我在莫斯科拜訪了他。那時他經常臥病，四肢染上風濕症，整天不出房門，只是抱怨。他並沒有消瘦下來，但他那整個豐富的面頰已經罩上一抹死屍般的蒼白，神情更加悒鬱了。他的眉毛的軒動和眼睛的凝視依然如故；這些動作固然使人不自覺地發生一種滑稽之感，但這滑稽之感却只能加強可憐的作家的整個形體所喚起的憐憫的情愫，因為他顯而易見是瀕于毀滅了。我開始跟他談到他的文學活動，談到彼得堡的很多團體如何重新評定他的功績，給他主持公道；我提及作為一部富于民族色彩的作品尤利·米羅斯拉夫斯基的意義……米哈依爾·尼古拉耶維奇的臉孔輝朗起來了。「唔，謝謝，謝謝。」他對我說。「我還以為我被人遺忘了，以為現代的青年都在痛罵我，鞭打我呢。」（米哈依爾·尼古拉耶維奇不跟我講法語，在俄語對話中他愛用有力的字眼。）「謝謝。」他激動地重複道，並且充滿

感情地緊握着我的手，好像人家是爲了我的原故纔沒有把他忘掉似的。記得當時我曾經想到所謂名作家的問題，異常苦惱。我心裏差不多在責備查果斯金的怯懦了。我想，這有什麼好喜歡的？——可是爲什麼他不喜歡呢？——他從我嘴裏聽說他還沒有完全湮滅……而對於一個人，再也沒有什麼比湮滅更令他痛苦的了。別的名作家或許連這點微不足道喜悅也沒享到就悄然長逝了。在輕率的讚揚時期之後緊接着便是同樣輕率的辱罵時期，再後則是默默的淡忘……然而，我們中間誰有權利說自己不會被忘掉——誰有權利說自己的名字會永遠爲後代子孫（他們有他們的需要，有他們的憂慮和憧憬）牢記着呢？

但我畢竟是高興的，因爲我能夠在善良的米哈依爾·尼古拉耶維奇的生命結束以前非常偶然地給了他一些滿足——儘管是瞬息即逝的滿足。

IV. 關於「父與子」

我最初想到寫父與子是一八六〇年八月間的事，那時我正在外特島。上一個叫做文特諾的小鎮洗海水澡；這部小說使我失去了——也許是永遠地——俄羅斯年輕一代對我的好感。我屢次聽見人家說我的作品都是「從理想出發」或者「闡揚理想」的，在那些批評文章裏我也看到同樣的論斷；有些人因此稱讚我，反之，另一些人却責難我；在這方面，我應該承認：倘若沒有找到一個在他身上逐漸孕育着各種適當因素的活人（而不是理想）來做憑藉，我絕不會想去「創造形象」。我缺乏任意發明的偉大天稟，而往往需要一個使我能以站穩脚跟的固定基礎。寫父與子時也正是同樣的情形；主角巴札洛夫的範本是一位令我深深地感動過的外省青年醫生（他于一八六〇年以前不久逝世）。

● 外特島是英國南海岸外的海島。——譯者。

照我看來，這位非凡人物便是那剛剛萌芽、還在醞釀之中、日後被稱爲「虛無主義」的原素的化身。這人給予我的印象異常強烈，同時却不太明晰；起初連我自己也無法清楚地理解他，於是我就聚精會神地傾聽和觀察我周遭的一切，彷彿要考驗自己的感官是否準確似的。教我爲難的是這件事：雖然我覺得這種原素隨處皆是，但我在我們全部文學作品中却連這樣的暗示也看不出；我自然而然地發生了疑竇：我所追求的不會是一個幻影麼？——記得跟我同住在外特島的有一位俄羅斯人，他對於已故的阿波龍·格利戈里耶夫所說的「時代思潮」有着極其銳利的眼光和出奇的敏感。我把那縈迴在我的腦際的念頭告訴他，但當我聽到他的意見時，我簡直怔住了，他說：「你似乎想出了一個類似……羅亭的典型，可對？」我啞口無言了：他說的什麼話？難道羅亭跟巴札洛夫是同樣的典型麼？

這幾句話大大地影響了我，有好幾個禮拜我都極力避免想到我計劃中的那部作品；但回巴黎之後，我又開始思索它——情節慢慢地在我腦子裏構成了：冬天我寫好了頭幾章，但小說的完成則是次年七月的事，當時我正住在俄羅斯鄉間。秋天我向一些朋友朗讀它，修改和補充了幾處地方，一八六二年三月父與子緣由俄羅斯導報發表。

我不想詳述這部小說所引起的印象；我只說，當我在阿卜拉辛商場發生著名火災的那天回到彼得堡的時候，已經有成千的人講着『虛無主義』這個詞兒了，我在涅夫斯基大街碰見的頭一位朋友脫口而出的頭一句話便是：『請看您的虛無主義者做的好事！放火燒彼得堡！』其時我心裏雖然千頭萬緒，但概括起來却只有兩個字：苦痛。我看出許多接近和同情我的人對我表示一種近乎憤怒的冷漠，而從反對派那兒，從敵人那兒，我却得到了祝賀，他們差不多要吻我了。這使我困惑……煩惱，但我並沒有受良心的譴責，我知道得很清楚：對於我所描寫的典型，我的態度是公正的，我非特不會心懷偏見，而且還很同情他；我極尊重藝術家、作家的天職，我不能昧着良心行事。『尊重』這兩個字用在這兒還不十分恰當；我簡直不能和不會用別的方法寫作，而結果人家却不讓我有這樣的機會。我的批評家們稱我的小說爲『宣傳品』，還提及我的『被刺傷』、『被損害』了的自尊心，然而我爲什麼要寫宣傳品呢——是反對杜勃羅留波夫麼？我雖則幾乎沒有跟他見過

● 俄羅斯導報，一八五六至一九〇六年間在莫斯科出版的雜誌，一八八七年以前其編者爲

M·N·卡特科夫。——譯者。

● 這是一八六五年聖彼得堡的大火，反動派一口咬定是進步份子放的火。——譯者。

面，但對於他不管是作爲一個人或作爲一位天才作家看，我都非常推崇。再說，無論我自己的才能多麼微不足道，可是我始終認爲把它花費在寫宣傳品，寫『誹謗文』上面，畢竟是犯不着的，不值得的。至于講到『被損害』了的自尊心，那末，我只消指出一點就夠了：一八六一年杜勃羅留波夫還發表過一篇論文，批評我在父與子之前所寫的最後一部作品前夜，文中充滿了最熱烈——憑良心說——最過份的讚揚，而他又是有權利以公衆的喉舌自命的。但批評家先生們却硬要一口咬定我是被侮辱的宣傳品作者：『leur siège était pris』——今年我還在宇宙副刊第一期（九十六頁）上讀到這麼幾行：『最後，盡人皆知，屠格涅夫先生的立足點主要是被杜勃羅留波夫擊破了……』接着（九十八頁）又述及我的『憤恨』：『不過，批評家先生是瞭解這憤恨的——也許還會寬恕它呢。』

● 讓我從我的日記中引證一段罷：『七月三十日，禮拜天。約莫一個半鐘頭之前，我的小說終于脫稿了……成績如何我不得而知——現代人大概會因爲巴札洛夫而把我罵得一文不值，××也不肯相信我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會那麼情不自禁地嚮往他（指巴札洛夫）——原註。』

● 青年批評家兼政論家，詳見回憶柏林斯基篇譯註。——譯者。

一個作者心裏想些什麼，他的喜悅與悲哀，他的願望，成功和失敗到底怎樣，——關於這些，批評家先生們大抵是無法十分正確地想像的。比方講罷，他們就不會懷疑果戈理所說的那種『享樂』——通過被描寫的虛構人物而鞭撻自己，自己的缺點。他們深信作者一定僅僅在『闡揚本人的理想』，而不願相信忠實有力地反映真理與現實生活乃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令這真理跟他個人的傾向並不符合。讓我舉個小小的例子罷。我——是一個澈頭澈尾的、頑固的西歐主義者，無論過去或今天我都毫不隱瞞這件事；但雖然如此，我却懷着特別的滿足在潘辛（貴族之家）這人物身上寫出了西歐派一切可笑的、俗惡的方面；我使得斯拉夫主義者的拉夫列茨基『在所有的論點上都擊敗了他。』我既然認為斯拉夫主義的學說是謬誤和無益的，爲什麼還這麼做呢？因爲，照我的理解，在一定的場合，現實生活正是這樣的，而我首先就想做個誠實和正直的人。當描繪巴札洛夫的形象時，我摒棄了他那類人物所有的引起美感的因素，却給他添上一重辛辣與粗獷的色彩！——並非由于我抱着一種要侮辱年輕一代（!!!）的愚蠢的希望，而只是觀察我的朋友D醫生以及跟他類似的人之結果。『現實生活是這樣的，』經驗又告訴我，也許我錯了，然而，

我要重複一句：我問心無愧；我並沒有自作聰明——我正應當這樣來勾劃他的形象。在這兒，我個人的愛好是無關緊要的；但我的許多讀者大概會驚訝不置的罷，如果我給他們說除了巴札洛夫對藝術的見解之外，我差不多同意他的全部主張。可是人家却硬說我站在『父親們』那一邊，雖然我在描寫帕威爾·基爾沙諾夫的形象時曾不惜違反藝術真理，把他的缺點誇張得近乎一幅諷刺畫，將他寫成一個可笑的人物！

誤解的全部原因，全部所謂的『災殃』是在於被我複製過的巴札洛夫典型沒有來得及經歷逐漸發展的階段，而文學典型通常都經歷過這樣的階段的。他可不像奧涅金或畢巧林，在他的命運中沒有被美化、被一致褒揚的時期。新人巴札洛夫剛一出現，作者便

● 許多人都證明我『對青年懷有惡意』——其中一位批評家還援引了巴札洛夫在鬧牌時輸給阿列克塞這件事件作為證據。『不知為什麼單獨要侮辱他，貶低他！他連鬧牌都不會』毫無疑義，假如我教巴札洛夫鬧贏了——那位批評家一定要露出勝利的神情叫道：『事情還不明白麼？——作者想讓人知道巴札洛夫是個騙子！』——原註。

● 帕威爾·基爾沙諾夫是父與子中父輩的代表。——譯者。

用批判的……客觀的態度去對待他。這使得許多人弄糊塗了——有誰知道呢！這或許是一個錯誤，至少是不公平。最低限度，巴札洛夫典型也該跟他以前的好些典型一樣，擁有被美化的同等權利。我剛才說過，作者對他所寫的人物的態度把讀者弄糊塗了；如果作者像看待生物般地看待他筆下的角色，即是說，僅只見到和道出他那壞的與好的方面，而對自己的產兒不明白地表示同情或嫌惡的話，讀者總是不舒服的，他很容易猜疑甚至惱怒。他不能循着已經畫好的路線行進，却需要親自去開闢一條蹊徑，所以他要生氣了。『讀起來

● 我會因為巴札洛夫的原故而受到無情的責難，外國人是絕對不能理解的。父與子有過好幾種德文譯本，一位批評家在評論最新一種譯本（里加版）時寫道：『沒有偏見的……讀者始終莫明其妙，急進的俄羅斯青年怎麼能夠因為他們的信仰與傾向的適當代表，即屠格涅夫筆下的巴札洛夫，而如此激怒，使得作者還受類似流刑的懲罰，並且還勸他以惡言相加呢？我們寧可設想：凡有最新的急進主義者都會興高采烈地承認自己的善相和同志——具有這麼剛毅的性格，毫無任何猥瑣、俗惡及虛偽之處的可驕傲的形象。』——原註。

● 奧涅金是普希金的敘事詩歌根。奧涅金的主角，畢巧林是萊蒙托夫的小說當代英雄的主角。——譯者。

真費勁！他自然而然會這麼想，『書本是供人消遣，而不是教人絞腦汁的；作者必須告訴
我對某個人物該怎樣看法——必須說出他自己對他是怎樣看法的！』倘使作者對這個人物的態度具有更曖昧的性質，倘使連作者本人也不知道愛不愛他所寫的角色（我對巴札洛夫的態度就是如此，因為我在我的日記裏提到的那種『情不自禁的嚮往』並非愛）——那簡直糟透了！讀者要向作者強求的是絕對同情或絕對嫌惡，只要能擺脫這討厭的『曖昧』。

『您那部小說的標題不該叫父與子』一位聰穎的太太讀過我的作品之後對我說，『因為您既否定了父親，又否定了兒子——您自己便是一個虛無主義者。』烟出版以後，抱着諸如此類的見解的人就說得更加起勁了。我不想反駁，這位太太講的也許是真理。能在寫作事業上，無論誰（我是推己及人）所做的不是他想做的，而是他能做的——能成功多少算多少。我以為我們對於一部美文學作品應當 en bloc（法語總括的）來評判，應當把作者的事業的其餘各方面平心靜氣地觀察（我不說冷眼旁觀）一下，同時向他嚴格地要求『誠實』。雖然我希望滿足我的批評家們——可是我不能承認自己的過錯。

在乎不誠實。

我彙集了有關父與子的信札及其他文件，編成一本極饒興趣的冊子。把它們對照起來讀一讀，倒也很有意思。有些人責備我將年輕的一代寫得太落後，太愚昧了，說這是對青年的侮辱，他們關照我說要『帶着輕蔑的笑聲燒掉你的相片，』——反之，另一批人却憤怒地罵我曲意奉承這年輕的一代。『您匍匐在巴札洛夫脚下！』一個通信者叫道，『您不過假裝挑他的錯處罷了；其實您是在向他獻媚，祈望他大發慈悲，隨便對您微笑一下！』——記得一位批評家曾經用了激昂而動聽的言詞當面對我講，他把我和卡特科夫先生看作兩個陰謀家，說我們躲在一間僻靜的小房子裏製造惡毒的圈套與謊言來陷害青年俄羅斯的力量。好一幅動人的圖畫！實際上這個『陰謀』是這麼回事：當卡特科夫先生

● 卡特科夫 (M. N. Karkov, 1818—1887) 政論家，大學時代與柏林斯基、赫爾岑及巴枯寧等甚接近，後任莫斯科觀察家和祖國紀事的撰稿人，一八五六年起編俄羅斯導報雜誌，原係自由主義者，甚至曾被目為軍爾尼雪夫斯基的後繼人，但六十年代初期，尤其是六三年波蘭起義之後，却日趨保守了。——譯者。

接到我的父與子的原稿（他對它的內容的理解是非常膚淺的）時，他感覺到猶豫了。在他看來，巴札洛夫這典型『差不多是現代人所祀奉的神明』，如果他拒絕在他的雜誌上刊載我的小說，我也不會驚奇的。『Et voila comme on écrit l'histoire!』（法語：這倒像在寫歷史了！）有人也許要這麼叫了……但是怎麼可以用這樣偉大的名詞去稱呼一本如此渺小的東西呢？

● 希望卡特科夫先生不要見怪，我想從他當時給我的一封信上引用幾句：『巴札洛夫先生即使並非神明，』他寫道，『至少也是鶴立雞羣，這是不能不承認的。他真正壓倒周圍的一切。跟他一比，所有的人都變成了老腐敗，或者顯得軟弱和幼稚了。我們願意得到這樣的印象麼？讀這部小說時，我感覺到作者想闡明一種他不太贊同的主義，但他在挑選字句之際彷彿躊躇起來了，終于不自覺地向它屈服了。我以為作者對小說主人公的態度有點兒拘謹，有點兒拙笨和勉強。作者站在他跟前似乎手足無措了，與其說愛他，倒無寧說怕他了。』我沒有使阿金左瓦用譏諷態度去對待巴札洛夫，卡特科夫先生也深表惋惜……整封信全是同樣的語氣，顯而易見，『陰謀家』中間的一個並不太滿意另一個的作品。

原註。

但另一方面，我也很理解我的作品在某些人心裏引起憤懣的原因。他們不是毫無理由的，我接受——這並非虛偽的謙遜——一部分批評。當時有許多人只要一抓到機會和話柄便打算制止那個屠捲俄羅斯社會的運動，他們利用了我所杜撰的詞兒「虛無主義者」。我使用這個詞兒不是爲了攻擊誰，也不是存心侮辱誰，不過把它當作表現一個顯著的歷史事實的正確適宜的字眼而已；但它却被曲解成告密與定罪的藉口——幾乎被曲解成可恥的標記了。那時候發生的幾件慘案更增加了人們的懷疑，它們彷彿證明了那種普遍的警惕並非庸人自擾，肯定了我們的「祖國救主」（其時我們俄羅斯也出現了一批「祖國救主」）們的努力與措施之正當。我們的輿論界本來就沒有什麼確定的方針，自然更捲起了滔滔波浪……我的名字上橫着一個暗影，我不能欺騙自己；我知道這暗影不會從我的名字移開。但另外有些人——在一般人面前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卑微——却說出了偉大的話語：「讓我們的名字湮滅罷。只要共同的事業得救！」我也奉他們爲圭臬。想到我所做的事于人有益，我就足以自慰了。因爲受到過份的責難而引起的不快之感，被這個念頭壓倒了。其實有什麼關係？二、三十年之後，誰還記得這些小小的風波？誰還記得我的名字上有暗影或沒有暗影？

可是，關於我自己已經說得夠了，應該結束這些瑣碎的回憶了——恐怕它們也未必能使讀者滿意罷。在告別之前，我只想給我的年輕的同時代人——剛剛踏上險阻的文學之路的我的同志們，講幾句話。我以前早已說過，我準備再說一遍：我對於自己的境况看得很清楚。我『爲繆司效勞』的二十五年是在公衆對我逐漸冷淡的情形下收場的，我也看不出他們有什麼理由會重新給我溫暖。新時代到來了，需要新的人物了；文壇上的老兵也像部隊裏的老兵一樣——差不多總是些殘廢者，那些善于及時地自動退休的人是幸福的！我打算說出我的臨別贈言，不是用教訓的口吻（況且我也沒有這種權利），而是用一個老朋友的口吻；那末就請用半寬恕、半急躁的心情聽下去罷，只要他所說的不盡是些囉囉嗦嗦的空話。我一定竭力避免它。

那末，我的青年同志們，我要對你們講話了。
我想從我們共同的導師歌德的話說起。

「把手伸到人類生活的深處去罷！每個人都生活在生活，但熟悉生活的並不多。窮者能抓住它，您就會感到樂趣！」

唯獨天才纔有這種「抓住」生活，「把握」生活的能力，而天才並非人爲的東西，何況光有天才也是不夠的。必須經常接觸你所要描寫的環境，關於你自己的感覺這方面，你需要真實，殘酷的真實，需要觀察和理解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最後，還需要教養，需要知識！「啊！我們懂得了！我們看出您的用意了！」說到這兒，也許會有許多人叫起來，「坡圖董的理想——文明，*Prenez mon ours!*」諸如此類的鼓噪不會駭住我，也不會使我放棄一點什麼。學問不僅是光明，如像民間諺語所說的，^①它也是自由。知識比任何東西更能使人自由，在藝術、詩歌的事業上比任何地方更需要自由，怪不得連官樣文章中都稱藝術爲「自由藝術」了。倘使一個人的內心受到束縛，他還能「抓住」和「把握」他週遭的一

① 坡圖董是屠格涅夫的烟裏面的人物，一個西歐主義者。——譯者。

② 「學問是光明，不學無識是黑暗」兩句話原係蘇瓦羅夫元帥的名言，後來衆口相傳，遂成

諺語。——譯者。

切麼？普希金深深地理解這一層，無怪他在他那首不朽的十四行詩——每個初學寫作者都應該把它當作座右銘，時時刻刻牢記着的——裏說：

『……你要隨着自由的心靈的引導，

沿着自由之路前進……』

帶便提一筆罷：斯拉夫主義者們儘管有着無可置疑的才華，但他們當中却從沒有一個人寫出過什麼有生命的東西來，就是因為缺乏這種自由思想的原故；^⑥他們中間誰也不肯取下（哪怕一忽兒工夫）自己的有色眼鏡。然而，在我們看來，缺乏真正自由思想（這是由于缺乏真正的知識之結果）的最可悲的例證倒是L·N·托爾斯泰伯爵的

● 指普希金一八三〇年所寫的十四行詩致詩人——譯者。

● 當然，人不能責備斯拉夫主義者們學識饒陋，教養不夠，但要寫出一部有藝術價值的作品，却必須同時具備許多（用最新的術語說）因素。斯拉夫主義者們所欠缺的因素則是自由思想；另一些人需要教養，還有些人需要才氣，等等——原註。

新作戰爭與和平，雖則就它的獨創的詩才而論，它差不多是一八四〇年以來我們文壇上首屈一指的作品。不沒有教養，沒有廣義的自由——對自己，對自己原先所信奉的思想與主義，乃至對自己的人民和歷史的無拘束的態度，是不可能做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的，沒有這，連活都活不下去。

了：
至於講到所謂「文學生涯」的最後收穫和最後評價，那末我又要想起歌德的話來

「如果這是一株玫瑰——它總會開花的。」

然而世界上沒有人所公認的天才，恰如沒有永垂不朽的功勳一樣。「無論是誰遲早總要被淘汰掉的。」已故的柏林斯基時常這麼說。倘若你能及時地儘可能地貢獻出你的力量來，已經很可感激了。唯有那般出類拔萃的人纔能不僅把自己的思想與見解的內容，而且把那形式，連同自己的人格（一般地說，羣衆是絲毫也不關切這一點的）流傳給後

世，平凡的人們却註定要完全湮滅，要被子孫後世的洪流所淹沒的；但他們增強了後代的力量，擴大和加深了它的圈子——這還不夠麼？

我本想就此擱筆……但我對青年作家們還有一個最後的勸告和一個最後的請求。我的朋友們，無論人家怎樣誹謗你們，請千萬不要爲自己辯白，你們無需竭盡心力向別人解釋誤會，不要說，也不要聽那些『最後的話』。好好地做自己的事罷——日後一切都會水落石出的。不管怎樣，先等它過一個相當的時期再講——那時候你們再用歷史的眼光來考察已往的一切論爭，如像我現在所做的罷。下面這個實例可以作爲你們的殷鑒：在我的文學生涯過程中，我只有一次想『說明真相』。那就是當現代人編輯部在廣告上通知訂戶，說因爲我的主張跟他們不合，他們已經拒絕我了（其實是他們請求我，而我拒絕了）——關於這，我手頭有好些證明文件可以覆案）的時候，我沉不住氣，公開說明了事情的真相；自然，我完全失敗了。青年們更加憤恨我了……『你怎麼敢打擾我們的偶像！無論多麼必要，無論你有什麼理由！你應該沉默！』——這個教訓于我很有益，希望你們也記取它。

而我的請求是這樣：請愛護我們的語言，我們的美麗的俄羅斯語言罷！它是一個無價之寶，是我們的前輩（在他們的前列大放異彩的仍然是普希金）賜給我們的一宗遺產！你們要珍視這個有力的工具，它會在行家手裏造成奇蹟呢！甚至對那些不喜歡『抽象的哲學』和『優美的詩歌』的實際人物（在他們看來，語言不過是表達思想的手段，不過是一根簡單的槓桿罷了）——甚至對他們，我也要說：最低限度也請你們重視力學法則，儘可能好好地利用每樣東西罷！——否則，老實說，當一位讀者瀏覽一下雜誌上某些死板的、拉拉雜雜的、空泛累贅的文章時，他自然而然會想道：你們正是用一根原始的支柱來代替槓桿呀！——你們是回到力學的幼年時代去了……

但話已經講得夠多了，再說下去連我自己也要變得囉嗦了。

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

巴登——巴登。